

青年中国



6
1957

毛主席和青年在一起



- ① 毛主席接見西藏青年參團全體人員。
- ② 毛主席接見參加全國專業團體音樂舞蹈會演的各代表團全體人員。
- ③ 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接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后勤先進工作者代表會議的全體代表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團校今年畢業的全體學生。
- ④ 毛主席和出席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學生代表談話。
- ⑤ 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接見了中央政法幹部學校今年畢業的全體學生。

以上照片①③⑤由新華社記者 侯波攝
 ②④由新華社記者 鄭健東攝



全面的、从实际出发来看农村问题.....范 森 (2)

这样
是不
是傻
瓜?

要有忠于革命的自豪感.....谢 岚 (5)

徐进是值得同情的.....碧 琦 (5)

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陈 冲 (6)

重要的问题还是在教育.....周 谦 (6)

怎样看待“公平”?.....雨 今 (7)

不能让公家包下来.....石 光 (9)

青年团历史参考资料 (续完)..... (10)

祖国青年们的燎原花朵 (忆“少共国际师”).....肖 华 (13)

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纪念挪威英同志殉难二十六周年).....沈葆英 (17)

当你看见了鲸鱼和蝙蝠的时候 (略谈思想方法上的一个问题:形式和实质).....若 水 (20)

“大张着眼睛”(读《随感录之一》).....萧也牧 (22)

尊师是共产主义美德.....丁 华 (24)

歌.....徐小赫 (26)

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 (一) (随周总理访东南亚所见).....杜 槐 (29)

从生理学角度谈结婚年龄问题.....张锡钧 (34)

诗 | 跳月.....夏国云 (25)

白石炮台上的姑娘.....白 艾 (33)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生生活.....汪子嵩 (35)

年青的当家人 (生活·思想·学习).....董泰华 (37)

我和妻子 (征文).....流 刃 (38)

社会工作义不容辞 (读者论墩).....赵 青 (40)

新 诗 | 县官和青蛙.....刘 诤 (16)

林 俄罗斯民谚..... (28)

封面插图: 来到了田边 (全国青年美术工作者展览会作品).....马啓坤作

封二照片五张: 毛主席和青年在一起.....新华社记者 侯 波、鄧健东摄

封三插图: 一年之计在于春.....梁玉龙作

封底套色木刻: 北陵 (全国青年美术工作者展览会作品).....马啓坤作

全面的、从实际出發來看农村問題

范 森

最近我有机会閱讀一些青年学生和青年干部寄給“中国青年”編輯部的信，这是他們在春节期间到故乡省亲訪友以后写来的。这些信反映了对农村的一些看法，其中比較普遍地提出了两个問題：一个是說农民的生活很苦，一个是說基層干部的作风很坏。

應該說，这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問題。农民实现合作化，發展農業生产，在农村建設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善生活，过幸福的日子。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生活如果坏了，誰还有心思建設社会主义呢？基層干部是党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农民群众最直接的領路人。他們的作风如果很坏，怎样能把农民群众帶动起来呢？

对于这两个問題，我願意談談自己的意見。

× × ×

三月二日，人民日报一版登了一条新聞，說：中共山东省委为了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活狀況，在春节期间，派出一批干部，向他們在农村的亲戚进行調查訪問。这些干部調查了十九戶社員，其中有十戶老中农、四戶新中农、五戶貧农。在这十九戶农民中，1956年收入和消費額都比抗战前显著增加的有十五戶，收入增加、消費額略为减少的有一戶，收入、消費額都比抗战前减少的有三戶。

我覺得，再沒有別的材料比这个調查报告更有說服力了。这十九戶农民的生活狀況，就是目前我国农民生活狀況的縮影；这个材料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完全可以根據这个材料概括地說一句：从全国範圍來講，絕大多數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經超过抗战以前；少数农民的生活水平，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完全达到抗战以前的水平；个别的則比抗战以前的水平降低了。

事情本來應該这样。絕大多數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提高，他們怎么会这样从心里拥护党和政府？“我們的革命胜利了”这句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說明全国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的情形，可以举出两个数字：一、現在全国农民的收入大大超过抗战以前，負担却远远低于抗战以前。大家知道，从1952年起，我国的粮食产量已經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份的11.3%；以后逐年增長，到1956年达到三千八百多亿斤。农民除了把相当純收入7%的粮食和現金繳給国家，作为自己支援国家經濟建設和国防建設的稅負

以外，其余全部归自己支配。而在抗战以前，全体农民要以地租、利息、賦稅的形式，把純收入的37%以上繳給地主、高利貸者和反动政府；貧农、雇农因为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少数生产資料，每年付出的地租、利息和賦稅，常常达到純收入的70%，相当目前农民負担的十倍。农民的收入既然增加，負担既然減輕了，生活水平怎么会不提高呢？二、在解放以后，农民的生活是逐年提高的，可以說一年比一年好。拿粮食消費量來說：1956年粮食产量比1955年增加了200多亿斤，国家征購的粮食却比1955年减少了几十亿斤。这样，农民消費的粮食就增加了200多亿斤。棉布，全国农民在1949年消費了四千五百二十六万匹，在1956年消費了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万匹，增加一倍半以上。許多高級消費品，像自行車、絨毛衣、手电筒……在抗战以前很少下乡，現在逐漸成为农民慣用的东西了。

前面列举的两个足以說明全国农民生活狀況的数字，是确实确实，穩当可靠，任何人都顛扑不破的。今年过春节的时候，还有些农民埋怨政府供应的猪肉少。有人由此得出結論：“农民生活水平确实不高。”依我看來，农民埋怨吃的肉少，正是因为他們的生活水平已有提高，对生活的要求也可能相应地更加提高了。这当然是好現象。在抗战以前，貧苦农民把春节看作“年关”；地主催租，債主逼債；农民东躲西躲，求一團圓飯而不可得，哪里想得到肉多肉少的問題呢？

当然，我們同样應該認識，我們的国家太大，人口很多，情况十分复杂，不管什么事情，都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到处一个样子。就拿农民的生活水平來說，总的看来是提高的，提高的比例还很不小。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極少数人的生活甚至暂时降低了。这里边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据我看，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大約有这样四种人：

遭受重灾的农户。在我們这个地跨热带、温带、亚热带的大国中，气象条件十分复杂；多少年来，由于水利不举，河道失修，經常發生水、旱、虫、雹等等灾害。据統計，从秦（公元前二四六年）到抗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大約两千年的时期中，平均每年要發生一次較大的水灾或旱灾。解放以来，国家为了

消除和减少自然灾害，投资之大，用力之多，远远超过解放以前的任何朝代。灾荒大大地减少和减轻了。但是，依我们目前的财力、技术和建国时间来说，还不可能完全防止和消灭各种天灾。不要说1954年和1956年的大水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就是丰收年月，也会有部分地区受灾减产。在1956年，许多遭受灾荒的农业合作社，经过坚韧持续的努力，战胜了灾荒，并且取得丰产的成就。可是有些农业合作社因为受灾过重，或补救不力，也成灾减产了，社员的生活水平也降低了。我看到的许多青年学生的信，正是从灾区的故乡寄来的。可以肯定，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自然灾害的范围和程度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的人力的限制，受灾的农民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援和救济。但是，希望在短期内完全消灭自然灾害却是不可能的。

缺粮户。解放以前，在某些地区，缺粮户要占当地农村户口的20%到40%。这些农民或者失掉了生产资料，或者缺少劳动力，农田的收入不能糊口，被迫外出雇工、作小生意……。解放以后，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粮户已经逐年减少，到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前，缺粮户大约只占农村总户口的10%了。应该说，我们“消灭”缺粮户的速度是很不慢的。现在，有些贫苦社员因为“家产”太薄，在合作社中一时还没有完全翻过身来；有的因为缺乏劳力而享受“五保”待遇，因为合作社的公益金还比较少，他们的生活还是不够宽裕。这就是这部分社员“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可以肯定，随着农业合作社有经济的不断发展，剩下的缺粮户在三、五年内是可以全部“消灭”了的。

有些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暂时低于合作化以前，甚至低于抗战以前。在那个时候，他们出租少量土地，雇佃少数短工，贷放小额借款，取得部分剥削收入；有的附带经营一些投机生意。他们的生活超过一般中农的水平，有的甚至接近富农的水平。解放以后，富裕中农的剥削收入逐渐受到限制；但是，即使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中，由于他们的生产资料较多较好，如果把生产资料分红和劳动分红合并计算，收入还比贫农或中农多。高级社取消了生产资料分红的制度，有些富裕中农的收入突然减少，生活水平就显著降低了。“农民的生活不如过去了！”这话如果不是指着地主、富农说的，就是指着这些富裕中农说的。当然，合作化不仅惠及贫农、中农，而且惠及富裕中农。再过三几年后，所有的合作社全都巩固下来，生产水平都超过抗战以前的富裕中农，那时，这些人的收入就会逐年增长，生活也会稳步改善。他们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

极少数农业合作社的不好，使一部分社员、包

括贫农社员的收入减少了。这样的合作社总数不多，各地大体都有一些。这些合作社有的在去年春夏两季，放松了副业生产，虽然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但农业总产值没有增加；有的把生产技术定的过高，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并且一度发生铺张浪费现象，在集体生产的第一年，没有显出合作经济的优越性来。有人说是农业合作化使农民的收入减少了；如果还有某些事实根据，只不过这么一点点。我们承认，尽管这种现象在合作化初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只要有人减少收入、降低生活，总是令人遗憾的缺点。去冬今春各地普遍整顿合作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消灭这种现象。我们完全相信，在两三年以内，也完全可以消灭这种现象。

× × ×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两个年头中基本上完成了的。它的规模之浩大，进展之顺利，在全世界是空前的。一面建社，一面生产，在合作社还没有巩固下来的第一年就战胜严重的天灾，增产两百多亿斤粮食，这在全世界也是空前的。这个伟大胜利的出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党的坚强、及时的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要求和觉悟，十多年来互助合作工作的基础，等等。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广大基层干部辛勤、努力的工作。在前年冬季大规模发展合作社的时候，在去年春季准备春耕生产的时候，许多基层干部就像置身战场一样地热烈、紧张。各种事情千头万绪，时间却是十分紧迫，多少人跟着他们，催促他们，要求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作决定；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耽误个人的生产，影响自己的生活在所不惜。大家想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支坚强、庞大的队伍，怎样能够把几万万农民在短时期内顺利地带动起来呢？

在农业合作化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基层干部的任务起了重大的变化。在合作化以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农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当时基层干部注意的重点是各种迫切的政治任务，对农民日常的经济生活是不大过问的。合作化以后，农民把自己的主要生产资料交给合作社，委托基层干部（特别是社的主要干部）“当”合作社的集体之“家”。这时候，基层干部不仅要继续领导农民完成各种政治任务，而且要研究和解决农村中各种经济性质的问题，像耕作制度的改革，集体劳动的管理，社员的经济生活的安排，等等。这副担子是很重的，广大的基层干部愉快地把它承受下来了。结果，在灾区，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严重天灾造成的损失；在非灾区，使80%的合作社增加了生产，80%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基层干部的重大作用，首先是要加以肯定

的。

当然，这绝不是說基層干部只有功劳、成績，沒有錯誤、缺點。各种工作中的錯誤、缺點，在基層干部中是相当普遍的，在某些人身上还是很严重的。問題同样在于要对这些錯誤、缺點加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析，这样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想出克服它們的办法。

許多人對基層干部的強迫命令作風有意見，這種意見是正當的。但我們應該怎樣認識這個問題呢？

我們有許多基層干部富有為人民辦事的热情，但是缺乏領導集體經濟的經驗。他們希望用最短的時間搞好最多的事情，難免發生一些毛病和錯誤，引起某些農民的 dissatisfaction。現在回想起來，在我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合作化運動，許多地區是在一年以內實現的。許多合作社建立起來，來不及進行從容、周密的準備，就進入包括大規模改變耕作制度在內的生產高潮中。許多事情只能邊作邊學；逐漸摸索，誰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辦法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發生某些錯誤、缺點，自然是難以避免的。以大規模的打井運動為例：去年河南全省新打一百零四萬眼水井，其中廢井約有五萬眼。是在短時期內負擔五十萬眼廢井的損失，打成一百萬眼好井，使它馬上發揮作用呢？還是為了不產生任何廢井，因而不去打井，或者小手小腳地慢慢來呢？這個問題当然是很容易回答的。俗語說：“吃一塹，長一智”。過去沒有經驗，現在逐漸摸到了經驗，再加上領導機關的幫助，基層干部這種性質的錯誤、缺點也會大大地減少。

少數基層干部在辦社、生產的過程中，被勝利沖昏頭腦，拒絕群眾的意見，脫離群眾的監督，一意孤行，給村里、社里的工作造成某些不應有的損失。極少數人貪污錢款，多占工分，開始走上墮落變化的道路。農民對這兩種人最有意見，這意見是很正當的。許多地區正在進行整社整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整掉這種惡劣現象和作風。只要農民群眾積極參加這種工作，一定可以逐步整掉這種惡劣現象和作風。

此外我們也要看到，某些基層干部所以犯了強迫命令的錯誤，有時候和上級領導機關是分不開的。去年某些地區的領導機關，片面地強調合作社增產、建設的潛力和可能性，制訂了過高的增產指標和過多的建設項目，規定了過分嚴格而又切不切實可行的技術改革措施，命令下級普遍照辦。有些合作社勉強執行，浪費了許多人力物力，基層干部是這些錯誤決定的直接執行者，群眾的意見自然容易集中到他們身上。但是，這些錯誤主要應由上級領導機關負責任，而不應該由基層干部負責任。隨著領導機關工作作風的改進，隨著基層干部鑒別是非能力的提高，這些錯誤是會逐漸地減少的。

既然多數農民的生活是有改善的，是向上的，多數基層干部是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那末，為什麼這些寫信的青年同志竟作了相反的判斷呢？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們看問題的观点、方法有毛病。

首先，他們看問題的方法不全面，所以不能了解事物的本質。他們聽到有些農民反映生活苦，並不調查研究到底有多少農民反映生活苦，是真苦還是假苦，究竟苦到什麼程度，就率爾作了“農民生活苦”的結論。把部分代替全体，結論自然就錯了。這些青年同志還不善于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從叫苦的農民的身份，他們所以叫苦的原因，來追究農民生活苦的真相，結果又把少數富裕中農的意見，當作了全体農民的呼聲。這些青年同志還不善于追尋各種現象的原因，不會對各種事物作歷史的分析和比較，結果把歷來就有的缺憾戶看作合作化以後的新現象，把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歸罪於合作社的經營不良。

其次，他們沒有真正懂得農業合作化是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是革小農經濟之命的道路。在合作化過程中，生產關係在變化，耕作制度在變化，農民的經濟生活也在變化。在踏實變化的時候，就難免發生一些變化的過多、變的不適當的現象。比如：有人認為合作社中的活路太累，冬季都不能休息休息。把過去的冬閑變成現在的冬忙，對發展生產是必要的。可是，如果勞動份量增加過多，農民自然會不滿意。合作社實行集體生產，必須要建立相當的制度，規定必要的紀律，對農民自由、散漫的習慣加以適當的約束。可是，如果制度、紀律過分嚴格，不能照顧各種特殊的情況，農民就要埋怨“太不自由”、“卡得過死”了。當然，誰都希望這些變化恰到好處，可是，恰到好處談何容易！沒有幾年的時間，沒有逐漸積累的經驗，想把全部合作社鞏固下來，怎麼可能作到呢？

第三，他們看問題常常不從實際出發，而從希望和幻想出發，這也難免發生偏差和錯誤。我們這個人口眾多、耕地很少（按人口平均）的大國，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長期的壓迫和剝削，生產力很低，人民生活困苦。要想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幾十年時間，需要持久的艱苦的鬥爭。舉例說，每人每天多吃一兩糧食，這個要求不能算高。可是，為了滿足這個要求，就得增產一百三十多億斤——一個很大的數字！我們考慮任何問題，總要從今天出發，既看到明天，也想到昨天，這樣就容易接近實際情況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某些報刊宣傳社會主義只講結果、不說原因，是有很大片面性的。“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若干年後，肯定會是這樣。但是，如果沒有我們這一代人畢生的努力，這目標怎麼能夠達到呢？我們是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際主義者。我們不能只收穫不耕耘，也不能只責備不盡力。



问题讨论

这样是不是傻瓜？

要有忠于革命的光荣感

黑龙江 謝 嵐

讀了徐進的信，我久久不能平靜。

徐進同志像千萬青年一樣，在解放後服從了革命的需要，走上了一條光榮的革命的途徑。但是徐進同志參加革命七年之後，當他回頭看到自己的弟妹，同學成了專門人材，得了學位，有優厚的物質待遇時，發現自己落后了，不光榮了，太傻了。在徐進看來，好像只有工程師、教授才是最光榮的，又有名，又有利，這是一種錯覺。

我自己沒有像徐進那樣光榮的經歷，沒有上過前綫，但是作為一個普通的教師，一個革命者，我並不像徐進那樣自卑，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里的每一個誠實勞動着的青年都是值得自豪的。在少年時代，1947年的艱苦年月里，我參加了革命工作，十年來我一直在教育崗位上工作著，我沒有什麼值得夸耀的成績，但是我得到安慰和鼓勵的是：在祖國的許多崗位上有我的幾千名學生，他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為祖國工作著，他們的成就鼓舞著我，使我自豪，促使我進步。有時候學生的一封信，或是在遠方給我寄來的一片樹葉，就足夠我受用不盡，使我深深的感到我的工作和祖國的建設是不可分的。

雖然我們一個中學教師的待遇沒有工程師，大學教授高，但是個人的進步或落后，工作的好壞，難道是看他錢賺得多少，和地位的高低嗎？我不是這樣看，我覺得只要我們對革命事業是忠誠的，我們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那我們在任何人面前都是理直氣壯的。沒有什麼自卑。

在我們的生活中，有時會碰到這種現象：有些人升了大學，有人被提拔當上了什麼“長”，有了較高的待遇和地位，但是這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是不值得羨慕的，我們是把寶貴的青春獻給革命，不是獻給“科長”和“工薪”。當然，我們青年人不能滿足於現有的一切，或者滿足於贊美別人的成就，從別人的成就中分享光榮。集體要求我們每個人做出更多的獨特的貢獻，使我們的時代開出更加燦爛的花朵。

過去我也會不安心工作，鬧過情緒，但是在黨的耐心教誨下，當我能夠平靜的想一想的時候，我就不能不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和難過，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是黨把我們教誨成人的。我生長在東北，當我的尿布晒在籬笆上的時候，正是日本“天皇”的旗幟帶著災難在祖國的土壤上飄揚的時候，敵人蹂躪了我的全部的童年，窒息了我的心靈……，是親愛的黨解放了我的肉體，並且用溫暖的光照亮了我的心靈，使我由一個愚昧的少年，變成了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成了一個受人尊敬的教師……，我們的一切能力，心靈上一切最美好的東西，都

是黨給我們的，難道我們不接受黨的教誨，為黨忠心耿耿的工作嗎？

從我切身的經歷中使我體會到，如果說我們今天還有煩惱的話，那麼，這種煩惱不應該是職位太低了，工薪太少了，而是本領太差了。事業的飛速發展往往逼著我們担負自己力不勝任的職責。像我這樣初中還未畢業的文化水平，九年前我就做了中學教師，五年以前我就在中級師範以後又在工農速成中學担任教導主任。有什麼辦法呢？我自己何嘗不希望能進大學去系統學習，但是事業不允許我們每個人都能進大學，黨要求我們工作，要求我們在工作中提高自己。而事實證明，既使在繁忙的工作中，我們也能够系統的學習，以至精通業務。千萬青年都這樣做了，難道我們應該例外嗎？

徐進同志有過光榮的歷史，過去為了革命的需要，會拋開了學業，自願的參加革命，把青春獻給了祖國。今天我們的祖國還是貧困的，它還需要我們年青一代百倍的努力來建設一個強大的新中國。我希望徐進繼續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祖國，無條件的為人民服務。

我也相信徐進同志是能夠進步的。二十五歲的年華，在短暫的人生中已經不算十分年青了，讓我們攜手共勉，共同前進吧！

徐進是值得同情的

河北 碧 琦

我很同情徐進同志，因為他的經歷對我來說也不是陌生的。

我也是個解放初期由於接受革命教育，在革命熱情的支配下，毅然放棄學習走出校門，參加了革命工作。經過在革命干校一段時期

的學習後，被分配到地區非常荒涼，氣候異常寒冷的塞外草原上工作。這個地區從氣候上說，每年烤火期達半年之久，在冬春季節經常是朔風怒號積雪盈尺，生活之艱苦可想而知。雖然如此，為了完成工作任

务，也必須在人烟稀少的原野上奔波。我經歷着这样艰难困苦所得到的代价是什么呢？还不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干部而已。

我有时这样想：在朝鮮的志願軍，虽然忍受艰苦，但是能够享受“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受到祖国人民的百般爱戴；在企業技术部門工作的同志，可享有很高的物質待遇，而我們这些終日忙忙碌碌的人，到头来落个名利皆空。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批評我存有利思

想。好了，那么咱們調換一下崗位如何？

当然，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如果認為在工業技术部門工作的就是“多劳者”，那我們何尝不願意做一个“多劳者”呢？再說我們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是否算作“少劳者”呢？这一点我还想不通。

再說直爽点，为什么在解放初期，生活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我們沒有这些思想波动呢？关键問題，我

認為是由于投机不假从組織分配和繼續求学深造的人占了便宜，而对革命忠誠老实，服从組織調动，放弃学习参加工作的人吃了大亏。

我从待遇上發表的这些意見，是不是一种个人主义呢？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这样認識。如果为待遇鳴不平都是个人主义的話，那么待遇上的划分等級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則也就会被塗上一層个人主义色彩。

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保定 陈冲

我自己也有和徐进同志类似的經歷。1951年7月，我才十五岁，就响应了祖国的号召，参加了軍事干部学校。那时我剛剛初中畢業。我的天資和学习成績曾經受到亲友、老师和同学的贊揚。当我报名的时候，一位动员別人參軍的老师，竟为了我的天資和學業偷偷地劝我繼續上学。1954年年底，我复員了。过去的亲友，一个个表示惋惜，有的甚至責备我当初走錯了路。同學們都上大学了，妹妹也念高中了。

复員后我开始是在一个电厂当會計，以后調做总务工作；去年六月，又調到电業局里当文書。調动頻繁，但一来工作需要，二来我自己也沒有什么專門技术，当然毫無价钱可講。

按照徐进同志的看法，我參干的时候才十五岁，完全可以不去呀！但我耻于这样想。

难道革命革錯了，革吃亏了嗎？沒有，革命不是就業，当初因为祖国的需要，我們挺身而出，参加了革命，为党做了工作，自己也得到了鍛煉，吃了什么亏，难道我們是以金錢的多少来選擇工作嗎？如果斤斤較量于个人的級別、待遇和地位，那还談什么“把我宝贵的青春獻給了革命”呢？

我并不是滿足于我現在所担負

的工作和現在的工作能力。我想，以我的基础，加上自己的努力，我还可以多做些事。

我很喜欢文艺，想当一个作家，哪怕是个业余作家；但是我現在还差的很，我缺乏系统的文艺理論和政治理論修养。曾經也有人劝我考大学。去年，我也的确这样打算过，并且花了不少時間准备功課。但是，在即将报名的前夕，我被調到局里来了。当然是由于工作需要才調来的。結果，考大学一事就只好作罢。

那时又有人說我傻。因为只要我坚持去考，有国务院的規定，領導上是不能不同意的。但我耻于这样做。学习本領是为了祖国；如果現在丟下祖国需要你做的事情不管，硬要去上大学，那學習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重要問題还是在于教育

北京 周謙

袁家坪同志認為，要解决徐进同志的問題，只有改变社会現狀，沒有物質待遇上的平等，思想教育就是徒勞無益的。这个結論未免下得过于武断，也未免把今天青年的覺悟估計得太低了。

的确，在我們今天的社会里，

我坚持着自修。自修是有困难的，系统地學習理論知識当然更困难，一本薄薄的“邏輯学講話”，啃了半年还没啃完。这条路阻力很大，但我們既然是新中国的青年，为什么非挑阻力小的路走？我觉得，如果我們自信还是一个革命者，就不要因此而抱怨当初革命革錯了。我們在还没有完成學業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自然給以后的学习造成了困难；但比同輩的人早参加了革命，是更多地尽了我們对这个时代的責任；我們还应当繼續忠心耿耿为人民工作，这是我們生活的目的，当然我們也不放松对自己的提高，对已造成的困难，就只能激起我們更大的毅力，更多的勇气，迎头赶上。如果我们自己不抓紧努力，以空虚的慨嘆消耗时光，整天的埋怨命运，埋怨領導，这样当自己真正觉悟的时候，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終身的遺憾。

还不能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由于工作性質的不同而帶來的物質待遇上的差別是存在的，你要說它是不平等也可以。但是这种差別，不仅今天存在，今后若干年也还要存在，这是我們現在社会的客观規律所決定的，不是由那個人主观地

制造出来或能够立即改变的。

其实，问题的主要一面是徐进和袁家坪等同志怎样对待这个客观事实。要求改变现状，提高生活水平是我们革命的目的。但是怎样去改变现状呢？如果是出于一种对革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那么应该是一种充满热情，满怀信心，群策群力，兢兢业业地去建设社会主义，以求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但是徐进和袁家坪同志不是这样想，他们的着眼点不是在如何继续努力，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利益着想，而是在打算我现在如何能得到高的地位，多的待遇，他们看上了“专家”“教授”的物质生活，最好现在也和他们一样，要不就来一个“甲加乙用二除”，从专家、教授那儿去分一点，大家都一样，

* * *

在“中国青年”

这次所发起的问题讨论中，徐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反映了很多青年

所关心的而又未被正确认识的问题。徐进同志看到自己当年的同学和自己的弟弟，当初，没有参加革命而在学校学习，现在有的已当了工程师、讲师，有的还将出国留学，被国家培养成专家。而他自己由于早参加了革命，离开了学校，虽然辛勤地为人民工作多年，并上过朝鲜战场，但到现在还是个一般政治行政工作干部，连科长也没有当上，无论在掌握专门技能上，或物质待遇上，都不如他们。于是产生一种委屈情绪，觉得党对他不公平，很后悔自己当初不该早革命。

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徐进这样的干部不公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对职位待遇提拔等问题如何看法。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革命队伍里的职位的高低，待遇的多少，提拔的快慢是根据革命的需要来决定的，而

这样他们就惹来许多烦恼。所以他们总是埋怨好的工作条件总是轮不到自己头上，好的命运总和自己作对；而对那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羡慕不已或大为不平；过去在革命中有过一些贡献的人会说：“我种的树，怎么叫你乘凉，真是岂有此理！”没有功劳的人，也会不知足的说：“我也是人，你也是人，为什么你偏要比我高呢？为什么不派我到苏联去留学，要不我也不就成为专家了吗？”这就是他们思想的实质，他们并不是希望大家都生活得很美好，而只是因为“我比有些人过得差。”

所以我认为，尽管现实生活中还存在某些缺陷，但整日怨天尤人的同志，主要的应该从自己思想上去解决。如果真的是客观现状不改

变，就不能解决徐进的思想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在我们国家中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他们的物质条件也许比徐进同志还要差，地位还要低，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傻瓜，吃了亏。他们经常想到的是集体，而不是自己；是事业，而不是地位和享受，正因为这样，他们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既能做有名英雄，也能做无名英雄。我想，如果不从思想教育去解决徐进同志的问题，即使他有朝一日当了“专家”“教授”，他又 would 得面临痛苦的，因为物质上的欲望是永远也填不满的。

这些道理可能大家都知道，但要做到，却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苦心。

* * *

根据前一种看

法：革命队伍里的职位待遇提拔等，

凡是根据革命需要

来决定的都是合理

的，公平的。自己是不是担任较高的职位，获得较高的待遇，对于抱这种看法的人来说，是无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一切真正抱有正确革命观点的人的看法。

根据后一种看法：如果职位待遇提拔等不是根据革命历史来决定，如果各种职业之间待遇上有差别，如果提拔上有快慢，这就是不公平。这种看法，是徐进的看法。这实际上是把参加革命当做追求职位待遇的人的看法。

就拿物质待遇来说吧，科学技术人员一类的专门人才，享受较高的待遇，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迫切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大量具有各种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适当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就能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这就是说科学技术人员享受较高的物质待遇，并不是因

怎样看待“公平”？

上海 而今

不是根据什么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这就是说革命队伍里并不是根据有多少人适合当部长，于是就设几个部长，也不是根据参加革命历史的长短来决定某些人是否应该当部长，而是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来设置的，如果革命当时不需要设置任何部长，即使有一万人适合当部长或者要求当部长，我们也不设置一个不提拔。待遇的问题也是这样。

另一种看法是：革命队伍里的职位待遇提拔等不应该根据革命的需要来决定，而应该根据参加革命历史的长短来决定，也就是说职位的高低，待遇的多少，提拔的快慢应该根据某人的革命历史来排定。譬如说同是一九五〇年参加革命的，要提拔最好一起提拔，不管他做什么工作，在待遇上不应该有什么差别，如果有拿钱多的职位，首先应该让那些参加革命早的人去担任。

家偏愛他們，而是從全體人民的利益出發的。在這里並不產生公平與否的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不從這樣的角度去看，而只從個人的角度去比較，是永遠也不會想通的。

再拿干部的提拔來說，這也是決定於工作需要，那里需要人，那里就提拔的快一些，比如，解放初期，我們要建立革命政權，設置國家機構，需要大量政治行政干部，那時，做行政、政治工作的干部就提拔的快一些。在戰爭中，死傷較多，需要增補，那時部隊干部就提拔得較快，當我們的國家進入了建設時期以後，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建設一個強大的工業國。要建立大批工業基地，需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需要大量的工業管理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但過去我們的工業和科學事業是落後的，這方面的干部也比較少，遠不能滿足當前需要，这就需要大力培養和提拔新干部，因此這幾年來，從事工業科學技術工作的同志就提拔得快一些。而做行政政治工作的同志，雖然他們的工作也做的不錯，工作能力也不斷提高。但是我們的國家機構和干部現在一般都已初具規模，所以這方面的干部就會提拔得慢一些，這樣做也是對的，否則如果一個部門的部長、科長等都配備齊了，但還大量提拔一些人做各種“長”，這樣“長”太多了，就使我們的國家變成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對國家又有什麼好處呢？其實，我們今天許多行政、政治干部，也還是趕不上工作的需要，不是大材小用。

即使同樣從事政治或技術工作的人，由於各地工作發展不平衡，干部的提拔也是不平衡的，在新建立的企業、學校，骨幹少，人員少，干部的提拔就要快一些。在干部比較多的地方就要慢一些。另外，干部提拔也受到職位的限制，一個科只需要一個科長，雖然兩個人差不多，都適合做科長，但也只能在他們中間提升一個。這樣就不能像徐進那樣只是從參加革命時間的長

短來比，也不能因為有一個一九五〇年參加革命的同志，現在提升為科長了，或工程師了，就平均地要求所有一九五〇年參加工作的人都應該提升。

徐進同志還有一點想不通的：既然今天需要大批的科學技術干部，徐進也願意去學習技術，掌握本領，但為什麼黨又不讓他去呢？而那些對革命沒有貢獻的人，現在倒能繼續上學深造，這樣不是又不“公平”嗎。事實上黨和國家是盡量照顧像徐進那樣的同志的，他們過去為了革命事業，拋棄了學業，今天革命勝利了，只有有可能總是盡量讓他們有繼續學習的機會。過去幾年，有很多老干部被送到各種學校去學習技術、文化；也有很多像徐進那樣的同志投考了大學。今天在高等學校里，不是有很多在職干部在學習嗎？但是這里又有一個革命的需要問題，國家一方面需要有一批人去學習科學技術，另一方面還需要有一批人繼續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黨不能把那些凡是想學習的都送去學習，否則其他工作誰來做呢？正如解放初期或抗美援朝時，很多青年都想參軍、參軍，但是不能全部去，有的需要留下來做其他工作，有的需要繼續學習，如果因為當時參軍、參軍光榮，大家都去參軍，不培養一批有學識有本領的專家，那麼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各種複雜的科學技術工作又靠誰來做呢？今天不能讓所有的人都去上學也是同樣的道理。

這些使我們不難看出：根本的

問題還在於我們對參加革命如何辦法，如果到革命隊伍里來，是為了爭地位、爭待遇，那麼比來比去，會覺得到處都不公平，自己也陷入不可自拔的苦惱中，如果參加革命，是做人民的勤務員，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是自觉地服從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那麼他就不會為一些待遇地位問題而爭吵不休。這里讓我們來舉一個事例吧！在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通訊里，寫了這樣一個革命戰士——何天星同志，他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為了革命出生入死二十多年，立過三次特等功，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黨員，但一九五二年，他帶着一身的痼疾和一筆殘廢金復員回到了家鄉，當了農業社的主任。如果按照有些青年的看法，何天星同志比徐進同志還要不平。但是何天星同志並沒有這樣想：他回到家鄉以後，沒有向群眾居功，沒有要求人員給他一點特殊的照顧，更沒有和這個人那個人去比地位，比待遇，而一心只是想著群眾的利益，他和群眾一起勞動，領導群眾走合作的道路。群眾生活困難，他就拿出自己的殘廢金來幫助群眾；遇到水災，他就以帶着傷又有病的身份，跳進急流去搶救群眾的房子，受災後，他日夜睡不著覺，想各種辦法來尋找生產竅門，使得他領導的合作社雖然遭受了五十年未有的大水災，還能獲得丰收，創造了奇蹟。這就是崇高的革命者的品質。本來使得同一輩人幸福，使得下一輩人更幸福，正是我們革命的目的，沒有什麼不公平可言。

本刊重要啓事

親愛的讀者同志們：

為了節約紙張，本刊從第二季度起，將有四期的篇幅由四十面減為三十二面。由於第二季度刊物的定價來不及更改，我們擬適當增加採色插頁等，補償讀者。

另外，從本年第三季度起，本刊篇幅一律由四十面減為三十二面，定價由現在的一角八分，減為一角六分。

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

不能讓公家包下來

石 光

前幾天，我到一個機關團委會去。辦公室裏，一位身穿毛料衣服的青年正理直氣壯地質問團委書記：“為什麼行政上不批准我的生活補助費，我有困難組織上為什麼不給解決？”“我是革命幹部，有困難不找組織找誰？組織上就有責任替我解決困難。”……

事後，團委書記告訴我，這位青年團員新婚不久，結婚時，為了講究排場和取得愛人歡心，花了很多錢，身上的毛料衣服就是結婚時新做的，但是卻欠下二百多元的債。愛人是農村的高小畢業生，沒有工作。他不僅要求組織上給以補助費二百元，還要組織替他愛人找工作。他還告訴我，這位同志參加工作還不到兩年害熱病休養了半年多，最近剛上班不久，只能做半日工作，工資每月58元照發。

我心里在琢磨：害了肺病半休半工作，工資是每月照發；自己結婚多花了錢要公家補助；愛人沒有工作要公家給找；願望沒有達到，還到團委會來質問書記，這是個什麼問題！

其實，這樣的事，豈止這一人這一件，在我們周圍，只要听听看看，就可以知道，這樣的事決不是個別的。

那麼，到底是個什麼問題呢？我完全同意團委書記的分析：在我們某些團員和青年中，有一種要公家包干，討公家便宜的個人主義思想。他們的理由是，我是革命幹部嘛，我有“困難”公家還能不替我解決。就在这个“我是革命幹部”的理由下，什麼“困難”都來了。上自父母，下至子女，旁及親屬，婚喪嫁娶，甚至買手表，置收音機，添料子衣服，春節回家置買禮送禮等等都要公家給包下來。今天戴上“革命幹部”的帽子，明天就送上申請補助的報告。這樣的事，別人听起来未免有些氣憤和替他們難為情，而他們却理直氣壯，泰然自若，好像真理就在他們那里，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還對組織不滿。

我不了解當他們提出這樣那樣困難，這樣那樣要求時，是不是想到過國家的困難。是否考慮到我們現在是在一個貧窮落後的經濟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建設要花的錢很多，國家那有力量把個人的困難和要求統統包下來，國家也不能因為你一個人參加了工作，就無條件的滿足你的要求，或是替你弄活全家。我想，如果國家真是這樣，那倒是叫人擔心的；因為如果一個人參加工作，國家就有責任養活他的全家和解決他的全部“困難”，那麼我們只能把肉補窟窿，把建設的物資挪用到消費上，來一個大家坐吃山空，把這點老家底都吃光了，也用不着談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了。所以當我們在向公家提出個人要求的時候，最好還是不要忘了我們全國人民最根本、最長遠的利益，多替集體着想，不要把自己能夠解決的困難推在公家身上，增加國家負擔，更不要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而故意製造困難，或是把小困難擴大為大困難。像前面所說的那位同志，本來是沒有困難的，如果條件不夠（譬如說物質條件）遲一點結婚也不要緊，就是急於結婚也用不着因講究排場而負了債，增加了自己的困難，也給公家添了麻煩。特別是在向公家索取這樣那樣時，最好也衡量一下自己到底對集體貢獻了多少。

當然，我並不是說個人有困難都不應該找組織幫助解決，也不是說凡是向公家請求補助的都是製造困難，增加公家的麻煩，更不是說因為國家當前困難大就可以完全置個人困難不顧。事實上，儘管國家當前的經濟情況如何困難，國家仍然為我們設置了許許多多福利事業。我們革命幹部除了每月得到應得的工資以外，還得到很多的照顧。病了可以公費治療，嚴重的可以休養，休養期還給工資；孩子有托兒所、幼兒園；冬天有取暖費；對有特殊困難的還根據情況給以長期或臨時的補助費……。這些都是史無前例的，這說明了我們社會制度的優越，黨和國家對我們的關懷。經歷過兩個時代的人們對這點體會最深。他們常說，在舊社會，只要能夠找到個職業就是幸事，至於工作條件怎樣，衣食住行如何，以及生老病死，有誰問過一聲。新舊社會的對比，給了他們很大的鼓舞。

其實國家的困難和國家對於幹部的關懷的事實，是人所共知的，我想那位青年團員和類似他的同志也不會不清楚，問題是由於他們所關心的只是他們自己。所以對集體的困難和有關集體利益的事情，雖然擺在他們面前，也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為所動的。他們參加革命工作不是考慮如何為集體多出點力，多作些貢獻，而是計算着如何從集體那里拿回些東西來，他們把公家當作一個滿足個人欲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倉庫，把參加革命，當了公家人當作任意向公家索取個人需要的資本。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把“我是革命幹部”“公家人”這樣的稱號仔細咀嚼一下，這個稱號到底意味着什麼？無疑地，“革命幹部”和“公家人”只能理解為“人民的勤務員”、為人民服務的人，為集體謀福利的人。作為一個革命幹部公家人，就應該時時刻刻為公家利益着想，以天下為己任，決不是以革命幹部作為護身符，把自己和個人無窮無盡的要求完全讓公家包下來。

最後，我還要提到某些單位的領導，在照顧幹部這個問題上，沒有很好的掌握原則，他們對於幹部的要求，不作調查研究，而是有求必應，有的甚至不求也應，普遍發給補助，沒有任何困難的同志拿到了補助費就存銀行或是揮霍掉。這種大慷公家之慨的作法，既浪費了國家財富，也助長了某些青年的個人主義思想，也應該引起注意和加以改正。



青年团历史参考资料

(接上期“为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而斗争的共青团”一节)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了不抵抗的卖国妥协政策，对内坚持内战，继续发动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更加促进了广大青年抗日爱国的觉醒。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卷入了抗日救国的热潮之中。在革命根据地，共青团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号召，英勇地参加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国民党统治区，共青团组织广大青年展开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运动。日本侵占东北以后，东三省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和党在一起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他们不断地破坏铁路、交通，给敌人以很大威胁。1932年，各地的青年还英勇地参加和支援了上海的“一二八”抗日斗争。

在这个时期中，共青团也向自己内部的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1930年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所谓“一切力量统一于武装暴动的行动委员会”的错误口号下，取消了共青团。这就严重地削弱了革命青年的有组织的力量，给革命工作造成了危害。这个错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被纠正了，共青团又重新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和活动。到1931年，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居党的领导地位时期，不少地方的共青团组织的先锋主义倾向又比较严重地发展起来。他们在“反右倾”口号的指导下，把那些坚持了正确的革命路线的党组织，统统当作“右倾”分子来加以打击和反对，不尊重这些地方党组织的正确领导，甚至直接代替了党的领导。这种错误，到1935年党中央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后，才逐步地得到了克服。

总观这一个时期，共青团虽然由于受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犯过一些错误，但仍然做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特别是在建立与巩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段极端艰难的斗争中，共青团丧失了許多优秀的领导干部，全国青年爱戴的恽代英、肖楚女同志，在白色恐怖中光荣地牺牲了，少共中央委员和其他重要干部，如胡南生等同志，都为革命而流尽了自己最后的一滴血。但是同时在这艰难的斗争中，共青团也锻炼和培养出一批

精銳的干部，这些干部后来都成了党和青年运动的宝贵資本。

四、共青团的改造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青年运动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省的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不久，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一致抗日，发表了有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着适应这种新的转变，党中央在同年11月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把青年团改变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救国的非党青年组织，凡愿意抗日的青年积极分子都可以参加。党之所以要改变共青团，主要是根据了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时的国际形势面临着帝国主义要发动侵略战争的危机，全世界人民迫切要求建立共同的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少共国际”依照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指示各国要改变青年团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以便组织广大青年参加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国内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空前严重的危急关头，这就要求青年团能团结一切抗日的青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当时共青团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倾向的存在，使团成为脱离广大青年的一个狭小组织。因此，党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团的组织。

党的这个决定，在当时是实现团结全国人民和青年一致抗日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根据党中央的决定，1935年12月20日，团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宣告要把自己的组织改变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的青年团体，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参加。经过一年多的试验和转变，到1936年冬，共青团正式实行了彻底的改变。

共青团的改变，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程。它摆脱了过去的狭隘性，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群众性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团结广大青年积极主动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5年，爆發了偉大的“一二九”學生愛國救亡運動。當時漢奸賣國賊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策動下，正在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的陰謀勾當，12月9日，北京一萬多學生為了響應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舉行了示威遊行，他們唱着救國歌曲，高呼着“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漢奸賣國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口號，向國民黨政府的代表何應欽請願。但是，學生的愛國行動卻遭到了國民黨政府血腥的鎮壓。青年學生從活生生的事實中，更進一步地看清了賣國政府的醜惡面目，懂得了如果不起來鬥爭，就是等待亡國末日的來臨。於是在12月16日，即傀儡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日子，北京學生和市民三萬多人又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在正陽門外召開了市民大會，通過了不承認“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任何傀儡組織，收復東北失地，全市罷工、罷課、罷市，允許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決議。在群眾的壓力下，漢奸偽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成立。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了全國人民和青年的響應與支持。從12月10日起，杭州、廣州、上海、武漢、天津及其他城市的大中學生，都先後發起罷課和請願遊行示威。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的文化界名流、上海婦女界代表等都先後發表了告工人書、救國宣言等，來聲援學生的救國運動。為了把救亡運動擴大到工人、農民和軍隊中去，1936年1月，北京、天津動員一批學生組成了“南下擴大宣傳團”，上海的学生組成了“上海大中學生救國宣傳團”，沿平漢、津浦、滬甯鐵路，向廣大農民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並幫助組織“農民救國會”。這些宣傳活動，不但對提高農民的愛國主義覺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廣大農民中撒下了抗日的種子，而且也實際鬥爭中教育和鍛煉了學生自己，使他們深切地体会到必須和工农結合，為工农兵服務。“一二九”運動的歷史意義是，它結束了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九一年間國內政治上的反動時期，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新高潮，同時又一次指出了知識青年與工农結合的明確道路。

“一二九”運動過後不久，1936年2月間，就在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的基礎上，產生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隊產生以後，發展得極為迅速，很快在天津、武漢、成都、鄭州、廣東，以至國外東京、里昂、巴黎等地都建立了組織。1937年春，在北京召開了民先隊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全國民先隊總隊部。到“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時，民先隊員已發展到兩萬人，它的成員除學生外，還有青年工人、農民、小學教師和士兵。民先隊在黨的領導下，動員和組織青年進行抗日救亡的鬥爭，揭露漢奸賣國賊的陰謀，組織隊員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技術，並幫助群眾

建立自衛武裝。後來，在解放區的民先隊併入了青年救國會，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民先隊，由於受到瘋狂的迫害，在1938年被迫解散。此外，當時在華北地區還產生了“平津學生聯合救國會”，到1936年5月，在平津學聯的基礎上，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國學生運動的統一組織——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在廣東，由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青年團體結合，組成了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在廣州淪陷以後，它就轉向農村，進行抗日游擊戰爭。在山西，1936年以平津流亡學生為主成立了“犧牲救國同盟會”，它在宣傳抗日、組織晉冀豫羣眾、訓練軍隊幹部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

為了總結青年抗日救亡運動的經驗教訓，進一步號召和團結全國青年擔負起民族解放的任務，1937年4月，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到會代表有五百餘人，代表着二十多萬有組織的青年羣眾。大會通過了“關於救亡運動任務的決議案”，提出了“全國青年救國綱領草案”，決定建立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並且制定了臨時的組織章程。會議確定青年救國會的任務是為一切為着中華民族的團結和統一而奮鬥，強調加強全國青年團結的重要性，批判了過去工作中“左”的关门主義傾向。大會最後一致同意，在全國青年救國會成立以前，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為現有各地青年抗日救國團體的最高領導機關。這次大會的主要意義就在於，它為抗日戰爭時期青年運動的蓬勃發展進一步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國代表大會以後不久，“七七”事變就爆發了，中國人民開始了全面的抗日戰爭。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在黨的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動員千萬青年投入了抗日戰爭。在解放區主要是動員青年參軍、建立地方自衛武裝，保衛羣眾生產，支援前綫。在戰爭開始的頭兩年，陝甘寧邊區的自衛軍和少年先鋒隊有八千多人參加了主力部隊，在北平和其他解放區，從抗戰開始到1940年上半年，有幾十萬青年參加了抗日軍隊，當時的八路軍、新四軍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青年。並且，為了加強青年的軍事訓練，便於有組織地動員青年參軍參戰，各地陸續建立了許多不脫離生產或半脫離生產的青年武裝組織，如青年抗日先鋒隊、抗日少年先鋒隊等。這些武裝在協助主力軍隊作戰、支援前綫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也在黨的領導下展開了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如宣傳抗日，慰問前綫戰士、救濟難民等，並且進行了爭取抗日民主自由、反對奸商走私和反對貪污的鬥爭。淪陷區的大批知識青年，在黨的號召下，紛紛奔向解放區，參加抗戰工作。

在各地青年團體相繼建立，青年抗日熱潮極為高漲的情勢下，為了把一切抗日的青少年和兒童廣泛地

團結和組織起來，並且推動全國青年運動的統一，西北青救會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延安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到會的除西北青救會的代表外，還有華北、華南、內蒙、南洋等地青年團體的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朱德司令、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都到會作了報告和講話，他們強調指出團結全國青年抗戰建國的重要意義，號召青年把抗戰建國的事業擔當起來，並向到會代表介紹了陝甘寧邊區工作經驗和八路軍里青年工作的情況。大會發表了告全國青年的宣言，通過了“抗日少年先鋒隊章程”和“兒童團組織章程”，決定成立“中華青年救國聯合辦事處”，作為領導全國青年運動的機構。

西北青救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隨着抗戰活動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青年抗日救國團體在全國各地就更加廣泛地發展起來了。

在解放區，由於青年救國聯合會的普遍建立，到1940年，已擁有會員一百多萬。它是抗戰期間解放區青年的統戰組織，凡願意抗日的青年都可以參加。它是解放區青年運動總的組織形式，曾領導着青年抗日先鋒隊、抗日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等。由於實行了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解放區的青少年和兒童被廣泛地組織起來，1940年，遼東省的調查，該省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青少年和兒童都參加了抗日組織。青救會的活動，主要是在農村中動員和組織青年參軍參戰，優待抗屬，同時積極地向群眾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開展生產運動，參加減租減息的鬥爭，組織群眾學習文化。青年抗日先鋒隊，主要是配合部隊和日寇作武裝鬥爭，破壞敵人的交通綫，保護群眾生產。兒童團則擔任站崗放哨，盤查行人的任務。那時，幾乎所有的村口要道，日夜都有持紅櫻槍的站崗放哨，或持土槍在頭山屋頂上了望，使得敵探奸奴不敢明目張膽地活動，便利了黨政抗日幹部深入鄉村去開展工作。

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初建立了許多公開的合法青年抗日救國團體。1937年11月，武漢建立了“青年救國團”，很快發展到了宜昌、長沙、河南、江西一帶。不久，河南也建立了青年救亡協會，安徽建立了青年抗敵協會。這些團體通過辦臨時學校、訓練班、講習會等形式，教育和培養了大批的積極分子，其中有很多人後來到了解放區。但是，自從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後，由於蔣介石越來越轉向了消極現狀，積極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方面，實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統治，千方百計地摧殘進步青年活動，所以原有的一些青年進步團體，都先後遭到了迫害和解散，大批進步青年被捕、綁架和殺害。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運動處於極其艱難困苦時期，經党中央的指示，對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工作實行了轉變，逐步由

過去搞轟轟烈烈的青年抗日救國運動，轉向隱蔽、分散的活動。以後黨就通過潛伏下來的青年積極分子，利用各種各樣的合法組織，領導青年進行了長期的反獨裁、爭民主的鬥爭。

當青年運動有了迅速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時候，1940年前後，在解放區的部分地區青年工作中，在不同程度上產生了一種脫離中心工作和脫離群眾的青年主義偏向。有些青年工作幹部忽視當時整個鬥爭的需要和全體農民的共同要求，片面強調青年的特殊利益，孤立地解決青年的特殊問題。結果造成了青救會與黨、農會、婦聯、武委會等四處鬧磨擦，既脫離了群眾，青年組織本身的活動也無法很好地開展。這種偏向經過党中央的及時指示，不久就得到了糾正，青年運動與中心任務結合得更密切了。以後青救會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發動廣大青年積極地參加了鞏固抗日根據地的各種鬥爭和工作，在反“掃蕩”、反“清鄉”鬥爭中，取得了光輝的成績。

到抗日戰爭的後期，由於廣大青年政治覺悟的提高，青年救國會這種群眾團體不能滿足先進青年的要求，也由於缺乏積極的領導，解放區的青年工作大都逐漸趨於鬆懈、自流、組織渙散，廣大青年雖然繼續參加了各種鬥爭，起了積極作用，但在許多地方，這種作用已不是由於青年工作本身有組織有領導地發揮的，而是青年在參加一般的鬥爭和工作中發揮的。這種情況到1946年10月，黨中央發出了建立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民主青年團的提議，並責成各地試建以後，就逐漸有了轉變。1949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兩年來各地試驗建團的經驗，發布了“關於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並于同年4月在北京舉行了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產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附 注 “青年團歷史參考資料”編到這里就算結束。這個資料主要是根據中央團校“中國現代革命青年運動簡史講稿”，並參照了其他有關歷史資料編寫的。由於現有資料的限制，對歷史上一一些重大事件還缺乏清楚的了解和細致的研究，這個材料中難免有不妥之處，希望了解和關心青年團歷史的同志能夠提出修正和補充意見。

更 正

“從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到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節中有以下更正：毛澤東同志在湖南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時間應為一九二〇年十月；在法國勤工儉學及華僑的先進青年中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人中沒有王若飛、秦和森同志；出席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中沒有劉少奇同志；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地點應為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

祖国青年們的燦爛花朵

——忆“少共国际师”

肖 华

象严寒的冬季已过，和煦的春天来临一样，我們偉大的祖国在摆脱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后，正欣欣向荣地沿着建設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我們这些曾經飽尝战争風霜的人們，当亲眼看到了祖国的青少年一代在燦爛美好的生活中蓬勃成長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压抑不住的喜悦和激动！我們满怀信心地歌唱着祖国的新生，百倍地贊美她光輝的未来；也为所走过的崎嶇曲折的道路、为黄金般的青春所留下的难以忘怀的甜蜜回忆，而兴奋不已！亲爱的朋友們：我願意为你們举出这些记忆中的一个片断。它虽然是二十几年以前的事了，但它的革命光輝始終是激励和鼓舞我們前进的一种力量。

我們就是“少共国际师”，
九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

.....
堅決的果敢的武裝上前綫；

.....
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摘自“少共国际师歌”）

“少共国际师”是富有革命战斗傳統的我国青少年們，忠于国际共产主义和热爱新中国的一个光荣生动的标志。

这是1933年的事。那时祖国的天空还被陰暗的云霧籠罩着，国民党反动派在四次进攻紅軍中央根据地遭受失敗以后，正糾集它所能調动的全部兵力和飞机，由蒋介石亲自部署对江西中央根据地作第五次大进攻。形势是十分严重的。“紧急动员起来，保衛革命根据地”，已經成为当时紅軍和根据地人民的战斗口号。为了滿足根据地青少年的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發出了成立“少共国际师”的号召。那时候，根据地掀起了熾热的扩軍运动，青少年的參軍掀的热火朝天，父送子、妻送郎，整排、整連、整營地武裝上前綫。1933年9月前后，就有七个少先队模范团插入了紅軍，相繼成立了“工人师”“兴国模范师”。与此同时，兴国、瑞金、宁都、長汀、建宁……各县的青年团員們和少先队员们，在各地团委負責干

部的帶領下，高举紅旗，手拿梭镖、長槍，成群結队地向宁都集中，不到三个月的工夫就有一万多人来参加“少共国际师”，其中青年团员占70%以上，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犹如祖国的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宁都正式誓师成立了。

二

“少共国际师”的成立，是为了抗击和粉碎敌人的瘋狂进攻，保衛革命根据地。“九三”誓师以后，就开赴石城展开了緊張的战斗訓練。那时除了青年們自己帶來的紅棉槍以外，还很少有别的武器。恰好三军团打下了福建的沙县，解决了敌人的一个师，“少共国际师”就派了一个团到前綫搬運了武器，把自己装备起来了。青年們一見新搬来的武器，高兴极了，整訓不到一个月，在射击、投彈、刺杀等軍事訓練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石城的街鎮上，到处傳遍了“我們少年先鋒队，英勇武裝上前綫”的歌声。那时候，反国民党的五次圍剿的大战役已開始，“上前綫去”“粉碎敌人高举进攻，保衛土地革命利益”“用我們的刺刀槍炮头顛热血，堅决与敌决死战”已成為紅軍战士們的一致要求。十月初，“少共国际师”便在中央根据地北綫配合五军团和三军团，开始投入了战斗，共同打击敌人的进攻。当时敌人对我們是采取了碉堡政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依靠堅固的碉堡、工事，加上飞机、大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四面八方向我們进攻。斗争是激烈而艰苦的。紅軍当时在党的“左”傾机会主义路綫之下，实行單純防御和敌人死拼硬打，但是士气仍然很高。那时北路蔣軍以三个师的兵力向建宁前进，“少共国际师”配合五军团十三师在黎川城附近的將軍殿一带扼守隘口；敌人以飞机大炮密切配合，向我們陣地跑轟飛行。敌人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我們頑强的打击，每天进不了几公里。我們一出击，敌人又不得不縮回到烏龟壳中去。这样对峙的攻防消耗战斗，对我們装备很差、粮彈不足的紅軍來說，尤其对我們新成立的部队來說，当然是極为不利的，但它却很好地鍛煉了我們。使我永远不能忘記的是1934年4月的固村战役。战斗是从早晨七、八点鐘开始的，一直打

到当天的黄昏，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当时，五军团十三师在德胜关正面抗击着来攻的敌人，三军团的主力从敌人的右翼，“少共国际师”和三师一部从敌人的左侧，形成左右两个拳头，向敌人钳击。经过多次的反复冲杀，最后终于将敌人的三个主力师全部打垮了，歼灭了敌人一部，缴获了不少的胜利品。但终因敌人离它的乌龟壳——黎川城太近了，大部敌人狼狈逃回黎川城去了。当战斗快要结束，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恼羞成怒的敌人又用飞机向我们阵地轟击、扫射。敌机在我们师部指挥所的山头上反复俯冲轟炸，被炸伤亡的有一百多个人。我和吴高群同志正在一棵大树的两个观察敌人的动静，一个炸弹丢在我们的附近，吴高群同志的头部和腰身上七八处的地方都挂了重花。但他仍然不肯下去。当我们把他抬到绷带所时，他已无法救治了，他那钢铁一般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亲爱的战友，我大概不行了，共产主义事业要靠同志们完成，请同志们为我们‘少共国际师’争光！为我报仇！”这位随毛主席湖南秋收暴动出来的山鹰一样勇敢的23岁的青年指挥员，说完了他最后的这句话，就闭上了他那流露着惋惜神情的眼睛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英勇榜样，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没有辜负吴高群同志的嘱托，在全师掀起了更高的歼灭敌人的热潮。七月二十一日在大脑寨战斗中，敌人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和火力向我们前沿阵地猛扑，我们和敌人拚了刺刀，反复冲杀，挫败了敌人。以后在十几次防御作战中，“少共国际师”也都打得英勇顽强，和其他红军老大哥部队一样树立了良好的战斗作风。

从1934年初秋赣前战役开始，“少共国际师”配属三军团指挥，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仗。其中以八月三十一日的战斗最为激烈。敌陈诚以最精锐的五个师和国民党中央炮兵团的兵力向我们西华峰一带阵地猛攻，经过友军和我师反复的出击给了敌人以极大的杀伤。那时部队一边作战一边还得修碉堡、挖工事，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人叫苦。部队生疥瘡和發瘧疾的很多，但没有药品，我们便设法用硫磺合了石灰水，煮沸后給生疥瘡的病員擦洗，很快就治好了；没有菜吃，我们大家动手，晚上点起火把到水田里抓泥鳅、拾螺絲，白天就在阵地上挖笋子、找野菜。在長期作战的陣地生活里，吃不到热飯，有时整天吃的是炒米加冷水，連彭德怀軍團長也和我们一样吃炒米。那时鹽巴和食油很缺乏，几个月不知肉味，部队因过度疲劳及营养太坏，体力大大下降，但我们大家知道受苦受难是为了革命，为了新中国。自上而下都互相关照、互相鼓励。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根据地人民群众和各县青年团、少先队、兒童团的热情帮助，没有草鞋給送草鞋，缺乏黃烟給送烟叶等，还經常派人來慰問我們，

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大家都能自覺地忍受和克服困難。那时最困难的要算是彈药，由于連續战斗的消耗，每人十發翻造子彈早已快打光了，一兩顆手榴彈都被看成是寶貝。但是誰的子彈袋里都是鼓崩崩的，这是同志们用竹筒子、木棒偷偷塞起来的。在陣地上都堆满了許多木、石，前沿布满了竹尖椿、篾柴，敌人进攻，我们就和它白刃肉搏。無論在作战或修筑工事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总是整天的来捣乱。九月一日，彭德怀同志正召集我和彭紹輝同志去研究敌情接受任务，敌人的飞机在軍团指揮所的陣地上丢了几个大炸弹，炸了几个方圆五、六公尺寬和深的大坑，但稍加修理和掩盖就可以成为很好的掩蔽部。彭德怀同志笑着对我们说：“蒋介石知道我們挖工事太辛苦，还特地派飞机来帮忙，这倒省了我們的事。”

敌人依靠着强大的兵力和火力，步步向我们逼近，从四面八方縮小对我们的包围圈，但我们仍能积极机智地对付它。敌人有时縮在乌龟壳里几天不露头，我们便想办法把它引退到我们的阵地前沿消灭它。我们的侦察员经常神出鬼没地混到敌人的后方去侦察敌情、抓俘虏。一次，我们师的侦察連長化裝成敌人的副官，混到敌人住地附近，正碰上敌人的一个司务長和两个采买人員在捉老百姓的雞，該侦察連長便以敌人長官的口氣喊：“不要动！你們是那一部分的？为什么捉老百姓的雞？”把这三个家伙訓斥了一頓后，就命令他們“跟着我走！”当快走到我軍警戒綫的时候，我們的侦察連長把帽子一脫就大喊：“你看看我是什么人？老子是紅軍！”把这三个呆头呆腦的家伙吓的目瞪口呆



呆，便乖乖地举起双手，被活捉了。象这类机智勇敢的例子很多。当然，部队英勇作战，并不能挽救我们在反五次“围剿”中单纯防御路线的失败。1934年10月初，我们“少共国际师”承担了掩护军团主力转移的任

勇，展开了石城保卫战。这是整个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这一仗打得很激烈。连续战斗的伤亡，原一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只剩了五千来人。这时候，根据地各县党和青年团，在战斗中帮我们补充了两千多人，为我们送来了大批的慰问信和慰劳品，使我们士气受到很大鼓舞。经过一年来的艰苦战斗，我们这支平均年龄不满二十岁的队伍，为了共产主义和新中国的理想，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三

在一系列的转移作战中，我们逐步地告别了熟悉的山水草木，告别了根据地里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战斗的现实告诉我们：为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去消灭敌人，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看样子是要离开中央根据地、离开我们用鲜血培育过的自由的乐园了！我们每次出发都唱着：“我们是红色的战士，为了保卫根据地，拼！直到最后一个人。”谁想到会真要离开这革命的故乡呢？但是，大家都坚信，总有一天是会打回来的。我们坚决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许多战士路过家门也不入，决心把自己壮丽的青春全部献给革命的武装斗争。

10月16日的夜晚，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最后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长征。那时候，我师改归一军团建制，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任务。前面队伍很多，总是走不快，很怕不能按指定时间到达目的地，后边敌人又尾追着我们，所以我们总是很紧张。但是，打仗也罢，行军也罢，战士们总是快活得很。情况稍一缓和，“兴国山歌”“上前线”的歌声就在长长的队伍中荡漾起来，加上山间的回声，实在热闹，很象一趟文化列车。经过敌人统治区时，居民们开始对我们还有点回避，听到了歌声，觉得红军这么快乐，很觉奇怪，不少青年就跟着我们看，混熟了以后，有些就跟我们一起走了。为着避免敌机的侦察与轰炸，我们都是夜间行军。在漆黑的夜里，走高低不平的陌生的山路是十分困难的。我们想了许多办法，在没有敌情顾虑的地方，每个人都准备了松枝或干竹杆，点起万干火炬，照亮了行进道路，宛如一条火龙，磷光闪闪，曲曲弯弯，煞是壮观。在有敌情顾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拄着一根结实的拐杖，帮助探路，背包上都放上一条白毛巾，作为联络记号，再加上不断地传着“跟上”“不要掉队”的口令，道路虽然难走，但也很少失掉联络。有时因情况十分紧张或发生了战斗，便化整为零，分路前进到指定地点集合。依靠着战士们高度的政治觉悟，我们的队伍是打不垮拖不脱的。

担负掩护收容任务，也有使我们为难的事。有些机关的掉队人员，总不像建制部队那样好办，在沒有

紧急情况的时候，他们总是三个一堆，五个一伙，拖拖拉拉地一路休息起来。丢开他们是不行的，因为敌人总是跟着我们的屁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了起来。但只要一有情况，他们也就很快地赶上了队伍。

夜行军最值得人回忆的是睡眠。江南晚秋天气，不冷不热，最适宜于旅人夜宿。大队的前面稍微有一点障碍，或者传来一声休息，整个队伍顿时就不动了。大家把身体斜靠在路旁，很快就睡着了，整个山川好像也睡着了。除了打鼾的声音和秋虫的鸣叫以外，一片寂静，好象什么也没有了。这时候干部们是不能入睡的，要前后巡逻，为睡熟的人们放哨警戒。前面大队一走，棍子敲棍子，大家爬起来揉揉眼睛又走了！有的还开着玩笑说：“这笔睡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还得清！”在十分疲困的战斗生活中，能打上一个盹，睡上一小回觉，确是一件快事。

敌情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不是碰到敌人的截击部队，就是敌人追击的部队赶了上来。我们的队伍人人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几乎天天要和敌人打仗，我们从江西出发到贵州，冲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这些封锁线上碉堡林立，敌人用钢筋水泥筑起了防御工事，还埋伏了层层队伍，形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圈，构成了绵密的火力网。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通过了赣江，占领了渡口，接连冲过了第一、第二道（在赣南粤北之间）封锁线，十一月十三日我军先头部队攻占了宜章城以后，我们就掩护军委机关纵队以强行军、急行军连续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这样就引起了敌人严重的注意。湘桂道上，一片云山峻嶒，蒋介石四处抽调的几个纵队已经赶到，对我们前阻后截，打算趁我们渡湘江之际，一举消灭我们。激烈的大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对于我们担任后卫的部队又是严重的考验。

湘西的十一月，阴雨连绵，河水骤涨。湘江上游的水面虽然不宽，但水深过顶，不好徒涉，渡口又只有两个浮桥，问题不大好办。为了掩护军委机关纵队和其他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我们开始在湘西延寿好一带抗击湘敌四个团的追击。接连打了好几天，等大家过去以后，敌人的追击队也已经逼近了，而且集结在全州和桂林两地的敌人，不顧死活地沿着湘江西岸向我们出击，企图强占湘江的渡口截断我军。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我师为了执行军团阻击敌人，掩护主力渡过湘江，通过全州、桂林公路第四道封锁线的任务，我们曾派出了一个团直扑全州城东的鲁塘圩。配合已渡河的第五团伴攻率制全州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拚，保衛湘江界首地段渡口。在掩护作战中，使我们最恼火的是敌人的飞机，这些鬼东西，反复地向我们部队轰炸和俯冲扫射，有时飞的很低，

連飛機上的駕駛員也能看得清楚；但是戰士們并不怕它，大家知道，只要打垮了地面上的敵人，幾架飛機是擋不住我們前進的。數天來，戰士們都打紅了眼，飯也吃不下，水也喝不進，在濃密的炮火下，用刺刀手榴彈等待敵人。從早上直到黃昏，敵人并不敢靠近我們。十二月一日下午，全州、桂林兩路的敵人沿湘桂公路向我軍渡河地段繼續猛攻，到天色快昏黑的時候，相距我們的渡口不過三公里了，槍彈都已落在渡口的浮橋上面。這時情況萬分緊張，搞的不好，我師就有被敵人切斷的危險。當我們率師主力從咸水圩渡河以後，忽然發現一個團沒有過來，而敵人却快逼近渡口了。這真把我們急壞了，當我們翻越了上下幾十里的大山，到達油樟坪集結的時候，原來被切斷失掉聯絡的那一個後尾團也已經英勇地搶渡了湘江，沖破了敵人的包圍，並在當晚以強行軍趕上了師主力，真使人喜出望外。

沖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錢，進入了黔桂地區之後，雖然也不斷地打些小仗，但我們已把大股的敵人甩在後邊取得主動了。我軍翻過險峻的越城嶺過了通道城以後，便分成二路前進。一路以四十三團為右翼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占湘桂公路上的鎮遠城，歼灭了敵人一個營，擔任對湖南方向敵人的警戒；我師的主力為左翼，經過苗嶺向北挺進。苗嶺是苗、侗、瑤等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這些兄弟民族由於長期受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壓迫，一看是漢人軍隊就有反感，開始，隨便到什麼地方，連個人影也見不到。這真是個問題。但我們認真地執行了民族政策，切實遵守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苗民不在家，我們吃了他們的糧食，燒了他們的柴火，就把銀元留在他們的米缸里或吊在他們的梁上，過了四、五天，苗民看到紅軍和國民黨軍

隊不一樣，就陸續地回來了。經過我們的宣傳和實際行動，和我們親近起來了，幫助當嚮導，抬担架，照顧留下來的重傷病號和掉隊人員。當我們離開苗區的時候，有的還跟着我們一起走，參加了紅軍。

四

在迎接1935年新年當中，我軍先頭部隊渡過了烏江天險，以戰鬥的勝利慶祝了新年。大年初一我們和一師部隊會合在余慶城。各個單位還召开了聯歡晚會。一師政委黃鞋同志是廣東人，是廣州暴動出來的，他不知道從那裏弄到了一隻小狗，親自動手燒狗肉來請我們的客。過去我是不吃狗肉的，那一次聚餐，狗肉滋味之鮮而香，使我至今都難忘記。

進入黔北之後，我師就經遵義，桐梓到达了松坎，擔任向四川方向的警戒。這時黨中央就在遵義舉行了有名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若干同志在軍事上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從此，使中國革命的勝利有了指靠。部隊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之下，鬥志更加高漲。我們“少共國際師”經過了一年半的戰鬥，完成了上級所給予的任務，已經鍛煉得更加堅強了。為了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使部隊更加精干，便于作戰指揮，全軍進行了整編。在整編中，“少共國際師”便和紅一軍團主力合併，繼續執行北上抗日的任務。但是“少共國際師”這個光輝的名字和她的革命的戰鬥傳統，永遠是中國青年運動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對於正在為社會主義和人類進步事業而戰鬥的中國人民和中國青年來說，也永遠是一種鼓舞的力量。

1957年初春追記于首都
(李國福插圖)



县官和青蛙

刘 铮

从前有一位县官，最爱睡觉。可是一場大雨過後，蛙聲從四面八方傳來，簡直跟敲響幾千張大鼓一樣，震得耳朵都要響，還哪里睡得成覺。

“哪個大膽敢在衙門附近喧嘩？”縣官問。

“是青蛙。”衙役們回答。

“青蛙么？快快把這些泥眼東西捉住，丟在池塘里活活淹死，一個不留！”

“老爺，那青蛙是會游水的呀！”

“胡說！你們哪里懂得？自古至今青蛙是從來見了水就要死的。”

早官正在跟衙役分辯，偏巧一支青蛙咯地一

聲從牆縫里跳出來，在院中的積水里自在地游過去了。不知為什麼，這件小小的事情卻給縣官增加了十分怒氣，他紅着脖子跳着腳大喊道：

“胡說！你們還有老爺懂得么？青蛙是永生永世不會游水的。即便有些會，也是最近才學，算不得什麼。再說既然學會了游水，那就不該再叫青蛙，應該叫什麼別的名字了。這‘正名’也是很重要的。快快把這些青蛙——不，應該改成別的什麼名字。——總之，快快把這些泥眼東西捉起來，丟在草地上讓他們活活干死吧！……快去！不准再多嘴！”

(黃偉基插圖)



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紀念譚代英同志殉難二十六周年

沈葆英



1922年，我十七岁的时候，摆脱了封建家庭的生活，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那时，代英同志在中华大学附中当教导主任，我二哥是他的学生，他们正办互助社，常在我家开会，有时还给二哥补习功课。我的

英文不好，也找代英补习，他很耐心教我，把桌上摆的一些书籍、文具、茶具等英文名称，教我学会，再教文法，然后教我会话；他用英语问一句，我也用英语答一句。我学得很有兴趣。他还常给我讲地理和历史知识，他讲鸦片战争、林则徐烧鸦片的故事，非常生动。我拿他和我们学校的老师比较，觉得他有很多长处：热情，耐心，讲得深刻，有风趣。每逢他来了，我们兄弟姐妹都欢迎他，把他当作好老师。

1923年，有一天，我无意地从二哥那里看到一本“中国青年”杂志，里面的文章谈的是：什么升学呀，选择职业呀，女子参政呀，马克思主义学呀，剩余价值呀……，都是青年所关心的问题。二哥告诉我，代英就是负责编辑中的一个。我便要二哥给我订了一份“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成了我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每篇文章都看，特别注意看代英写的文章。我看了，把它秘密地压在其他同学的枕头下，挨房挨床地偷阅，就这样，“中国青年”在我们学校里广泛地传开了。进步的

同学都纷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我也参加了。每天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书籍，有了问题，就写信问“中国青年”编辑部，代英或肖楚女总是给人满意的答复。

“中国青年”，使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共产主义理想在我思想上慢慢树立起来。1924年我便加入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这时，代英在上海、广州等地奔走革命，我们常通信，谈些革命道理，我们志同道合，书信往来已超过一般同志的情感了。

1926年秋天，北伐军占领了武汉。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在武昌省立一完小教书。

一日黄昏，代英来学校找我，原来他随着北伐军回到武汉，是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教官。我听他谈北伐故事，直到深夜。

学校里教职员、学生见代英回来了，都要他演讲。他讲话十分生动，有条理，富于鼓动性，会场里四、五百人，都被他的话吸住了。讲完了，听众还不满足，要他继续讲下去。他常被邀到学校演讲，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我和代英结婚了。我除了当教员，还兼省妇协的秘书，常要给妇协写通讯、宣言，我不会写，代英帮助我，我写个初稿，给他看，他从观点到文字、结构，一一指出有那些毛病，应如何修改，一篇文章要反复修改多次。记得我写“恋恋不舍的裹脚毡”，是反对妇女裹足的，就修改了四、五次。有时心里急躁，他就鼓励我，说，文章是给大家看的，不能不慎重。

代英工作忙，深夜才回家，我们聚在一起闲谈的时间并不多，但我们却互策互励，互敬互爱，感情十分真挚。

马日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准备屠杀共产党员，局势显得很紧张。

一天下午，代英回家了，神情愤慨，对我说，国

民党已逼得他了，要走了。我問：“什么时候走？”他說：“馬上就离开。”我要同他一塊兒走，他說，离开武汉，不是逃避，是去組織战斗，不能帶我去。又叮囑我，好好注意掩蔽，万一被国民党捉去，不要动搖，不要怕牺牲，永远坚持到底。

代英走后，我沉思了兩個鐘頭，覺得不能呆在家里，便脫下旗袍，換了件長衫子，帶頂禮帽，把短頭髮盤在里面，扮作男裝，离开了家。在江边搭上小船，順江北上，又跋涉了几十里崎嶇的小路，来到汉陽乡下一个远亲家里。

第二天，三姊赶来乡下看我，她告訴我走后發生的事。他說，一部分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屠杀了，电线杆上还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哩！在我离家后不到一小时，屋子里外前后都布满了敌人，他們搜查我的房間，將我和代英的相片、畢業證件，尽都收去。他們發現我的洗脸盆里的水还是温热的，以为我們藏着，硬逼代英的老父和子強弟，要把代英和我交出来，沒有結果，他們便把父亲和子強弟捆綁着，帶走了！

这些暴行，是多么令人憤恨！

我住在汉陽乡下亲戚家里，除亲戚外，別人都不知道我的底細。亲戚叫我“四姑娘”，从不提名道姓。与外面的联系都斷了，只三姊偶尔来看看我，帶些書来。

沒有工作，沒有同志，日子过得真悶。我时刻都怀念代英，不知他正做些什么。

1928年的春天，三姊帶來了代英的信件，信上是化名，写得很簡單，他在香港，叫我去香港去。

第三天，我就动身了。从汉口乘船到上海，在上海换了海輪到了香港。到香港，正是黄昏时候，我便直到代英信上約定的旅館里住下。在香港，我沒个熟人，又不知代英住处，心中正自納悶，代英却帶着笑走了进来。他說，此地不是談話处，便領我到他的地方去。

代英自离武汉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然后到了香港，秘密地作党的工作，我来了，便直接在他領導下做宣教干事，他教我收集整理国际国内政治材料，要注意階級敌人內部矛盾。他告訴我，在工作室里，要注意窗戶以外的事，要有高度警惕。当时香港的环境是复杂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到处横行，我們的住处，是租的老百姓的房子的二樓，在房子里，也要特別机警。

代英有时在家里开会，有时出去布置工作，夜以繼日，他的臉瘦削而蒼白，但精神却飽滿。在他們开会时，我便在樓下放哨警衛。

有一天傍晚，同志們正在樓上开重要會議，我一

人坐在樓下把門关上，时时注意着門外的动静。忽然一陣敲門声，很急，这不是自己人敲門的声音（我們敲門都有暗号的），我急忙上樓去报信，就在我上樓的时间，樓下的房东把門打开了，大批巡捕蜂拥到樓上，他們一面搜查，一面把同志都捆起来，又拿着槍对着我的胸口，硬要我在同志中間，指出誰是我的“男人”，我知道他們的用意，他們是想讓我說出誰来，就确定誰是主持人。其实代英这次恰巧不在家，沒有参加开会。我便說，我是刚从内地来找亲戚的，不認識这些人。巡捕又百般威胁我，我只裝作不知。他們見我身穿旗袍，脚穿皮底鞋，不像香港打扮，便气势汹汹的把几个男同志逮走了。

同志們被帶走以后，我趕緊把窗外的一串辣椒收了，（这是表示出了事故的信号，外面的同志就不会再来了。）自己也不能仍呆在这屋里，便也走了。

大街上灯光耀眼，我尽揀暗地走，也不知走了多远。夜深了，我才走进一間普通房子，以剛从外地来，找不着旅館为理由，向主人借宿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又在街头流浪。

代英也不知在哪里，捉去的同志也不知怎样，我心里真不好受。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我在街头徘徊的时候，忽見代英远远而来，見他的眼色，知道不应在街上說話，便尾随他走，来到另一間屋子里。

我和代英談起这几天的境遇，流露出难过的感情，他觉察出来，幽默地鼓励我說：“你看，又是小姐脾气了。革命是免不了風險，免不了牺牲，要受得住考驗。我还以为你也被捕了的。你掩蔽自己，还算有机智的。”

1929年，代英和我都在上海，他担任党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党的四中全会正在上海举行，我白天忙于会场纪录，晚上还要整理材料。这时，我已生了个兒子，但我不能仔細看顧他，我出去工作，便把他擱在床上，讓他自己一个人躺着、哭着。我們經濟不充裕，买不起奶粉，而我因工作忙、身体弱，奶水也不足，孩子营养不好，瘦小得很。

有一晚，我抱着孩子喂奶，孩子沒吃飽，哭个不休。看着那枯瘦的兒子，我不禁也掉起泪来。正在此际，有人輕輕拍了我一下，說：“这不是奶粉嗎？”我一看是代英，手里拿着一盒奶粉。我全明白了。代英工作是那样忙，每天到半夜才回，还不睡，却要坐下来讀書，原来是为了奶粉！

我覺得，在我眼前，擺着兩重任务，若要做好工作，則难帶好孩子；若要帶好孩子，便难做好工作。內心感到非常矛盾。代英却以乐观精神，为我分析。

他說，目前困難之所以產生，主要是由於階級敵人存在，目前要打擊敵人，就要面對着困難，不在困難面前徘徊、却步。他說，要去鬥爭，在鬥爭中鍛煉自己，添加革命的力量；孩子也要安排得當，我們艱苦奮鬥，也是換取下一代光輝的未來。他說，共產黨人沒有黨性和母性的矛盾。他建議把孩子安排在托兒所里。

听了他的话，我心便开朗起来。我便把孩子送进私人的托儿所。这时孩子仅只八个月。

1930年春，党内正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代英是坚决反立三路线的一个。可惜当时党还缺乏经验，反派他去下層直接领导行动委员会，我也被派到閩北区委会做工作。

为了更好掩护自己，发动工人群众，我穿上工人服装，进缫絲厂作工人。我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乍与工人接近，办法不多，代英常叮嘱我接近工人应注意的事情，逐渐我同工人熟悉了，有空便教他们识字、唱歌，歌詞都是編的，在歌詞中貫穿着階級教育，比如有一支叫“女工苦”的歌：“小小年紀小姑娘，手持飯菜筐，冷飯半碗留下充飢腸。進工廠，北風吹進破衣裳，十幾個鐘頭真是長，望不到出廠。”唱着，有的女工便落泪了。代英認為這方式是好的。

我还负责代英的保护工作和“交通”（即是聯絡送信的人），每天起床，我就把他需要的东西准备好，又给他衣袋里放几个零錢，以便买燒餅充飢。然后他到滬東去工作，我到閩北缫絲厂。下午我下工了，又給代英送信、和其它同志聯絡。虽然艰苦，但工作得很有乐趣。

四月十九日，代英照例到滬東去开工人活动分子会，他扮成工人，穿的工人服装，把那付深度的近視眼鏡也脫去了。會議結束，他离开时，在馬路上，突然碰到便衣特务在搜查行人，他迴避不及，特务們要他举起手来，搜查他，并把他捉去了。

这消息我是在閩北区委那里听到的，我焦虑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区委的同志劝慰我，要我鎮定下来，并說我不能再回家里，我当天便搬到閩北貧民窟和女工住在一起了。

代英被押到南京伪中央軍人監獄里。听说他在逮捕时，把自己的臉抓破了，血流滿臉，敌人沒認出他就是傅代英，他却借此掩护了身分，化名王作霖，說自己是個普通工人。“普通工人擅自开会，也有罪”，国民党的官員說。便把他判了几年徒刑。

在監獄的日子里，看書写信是很不易的。但代英很結人緣，（又有党内作工作的人）托人秘密地买进一枝鉛笔，就偷偷写信發給我，信中字迹模糊，內容

多系暗語，但我猜得出他是暗示我：要好好工作，好好保护孩子。

有一次，我拿着一个小包去探視他，从上海搭火車到南京，下車又走了几十里荒涼的野地，就到了一所黑鉄大門的圍牆里，警察把我引过几層險深深的甬道，來到一間小屋里，這屋子牆上有塊四方的小洞，隔牆三尺远的对面对牆上也有这样一塊小方洞。远远傳來一陣鉄鏈的聲音，——是沉重的脚聲，兩個看守拉着代英來了。我見他頭髮長長的，穿着囚衣，不覺一陣心酸，就哭着，只問了句：“你怎麼哪！”喉嚨哽塞便再也說不出什麼來。

代英的態度却很鎮靜，他說他身體還好，沒有生過病，他說，刑期滿了，還能像過去一樣，生活在一起。剛說到這里，警察走過來，向我瞪着兩眼，我哭着求警察，說：“他是病人，你放他出來吧！”警察大聲吼叫着：“時間到了，不許說話了。”代英看了我一眼——眼光是多麼堅定！就被兩個看守拉走了，我急忙伸手去拉他，可是那里探得着啊！

党決定挽救代英出獄，很多負責同志都為他奔走營救，事情進行得有點眉目，因為代英沒有暴露身分，有出獄的可能。一天，帥大姐來找我，給我送來救濟費，滿臉快樂地對我說：“恭喜你，代英同志有出獄的希望了。”我忙着給代英買了兩件衣服，并把房子收拾乾淨。

一天一天地過去，代英還是沒出獄，情況突然惡化了，叛徒顧順章出賣了代英，国民党知道他就是傅代英，出獄的希望成泡影了。

1931年4月29日中午十二時，代英犧牲了，他身中數槍，躺在血泊里，還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勞動人民團結萬歲！”

從此，我和代英同志永別了！他的精神，他的聲音笑貌却銘記在我心中。我擦干了眼淚，踏着他的血跡繼續戰鬥！

* 本刊本年第四期封底和封二發表的 *
* 旅順中蘇友誼塔浮雕：“莫斯科——北 *
* 京”“中蘇人民大團結群像”，均系東北 *
* 美術專科學校雕塑工作室創作，特此注 *
* 明。 *

当你看见了 鯨魚和蝙蝠的时候

——略談思想方法上的一个問題：形式和實質

若 水

鯨魚不是每个人都看見过的，可是我們在圖片上或者電影上可能都看見过。至于蝙蝠，那是大家所熟悉的。讀者們！假定你們在還沒有学过動物學之前，看到了一條鯨魚（不管是在圖片上、電影上还是在實際的海洋上）或者一只蝙蝠，你一定會把鯨魚當成一種魚，把蝙蝠當成一種鳥，是不是？

但是動物學家會告訴你說：錯了！鯨魚不是魚，蝙蝠也不是鳥；這兩種動物都屬於哺乳類，是兽。

你以為鯨魚是魚，蝙蝠是鳥，是根據這兩種動物的某些外表特征來說的。比如說，魚的特征是會游，鳥的特征是會飛，于是你就會根據這個觀點認為，鯨魚會游，不是魚是什麼呢？蝙蝠會飛，不是鳥是什麼呢？可是動物學家不這麼看。動物學家認為，雖然魚會游，鳥會飛，可是會游的不一定是魚，會飛的也不一定是鳥。有些蟲也會游或者會飛，可是它們還是蟲，不是魚或鳥。鯨魚同魚雖然很相像，可是從本質的特征上看，並不是同一類的東西；蝙蝠同鳥也是這樣。鯨魚是熱血動物，胎生，用肺呼吸空氣，有的鯨魚還有牙齒，它的四肢雖然退化變形了，但還保留着痕迹。這些特征都是魚所沒有的。根據許多事實來看，有的動物學家認為鯨魚原來是生活在河岸陸地的哺乳類，後來才遷居到水里去的。蝙蝠也是胎生，雖然有翼，可是這種翼同鳥的有羽毛的翅構造根本不同，而是一種彈性膜，實際上是前臂；它還有鳥類所沒有的牙齒。根據這些特征來看，不管鯨魚同魚，蝙蝠同鳥，在其他方面似乎差不多，但終究不是同一類的動物。

我舉這個例子，不是為了講動物學，只是為了談談思想方法上的一个問題。在實際生活里，也有很多形式上相似而實質上大不相同的事情，對於這些事情，我們如果不善于鑒別，也會發生把鯨魚當作魚，把蝙蝠當作鳥的類似錯誤的。

比如大家常常反對那種“扣帽子”的批評方法，就因為這種批評方法常常是只看形式而不分析實質的。喜歡“扣帽子”的人，往往只抓住一些片斷的表面的現象。就馬上判定這種現象的實質。例如，官僚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是不關心群眾的生活和疾苦，對群眾的合理要求不予滿足，于是有人便認為凡是自己提出要求而領導上沒有給以滿足，那麼領導上就是官僚主義，不管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應該滿足。又如

由於農民的生活比較艱苦朴素，於是凡是精打細算，不肯鋪張浪費，反對開氣排場的便都被譏為“農村作風”“農民意識”。……這一類批評方法，不是我們每個人都看到過么？

這一類“扣帽子”的批評並不一定每次都是錯的，因為確實有些領導者對群眾的合理要求是重視和關心不夠的，或者對不合理的要求沒有進行耐心的說服和解釋；有些省儉朴素的人是具有農民意識的（當然，農民意識也不一定全都不好）。但是，如果光憑這樣一些簡單的现象而不加分析地判斷，那麼即使這頂帽子扣對了，也不能給對方什麼思想上的幫助；何況還會常常扣得根本不對，發生“張冠李戴”的錯誤，——把鯨魚當成了魚。

要不犯把鯨魚當成魚的錯誤，就要不單從形式上着眼，而且還找出本質的東西。上面說的那些例子，可能是已經為讀者所懂得了的。讓我再舉一個比較新鮮的例子。

自從提出了獨立思考和百家爭鳴的口號以後，學校里的學風是有顯著改變的，如死背筆記的風氣有轉變了，上圖書館借參考書的人多起來了，等等。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並且是事情的主要方面。但是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表明許多同學對“獨立思考”還理解得不正確。有的人認為既然要獨立思考，就不應該向任何人請教，不應該同任何人討論，而應該完全憑自己思索；有的人以為一定要在書本上寫的、教師講的以外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來才算是獨立思考。這種情況發展起來，就會是胡思亂想，或故意抬扛。有時明明覺得對方有理，但偏偏要反對他，借以表示自己是“獨立思考”。據說有一個大學生在課堂上硬說司馬光和司馬遷是一個人，教師指出根據歷史記載毫無疑問是兩個人，這個學生還說：“不，我認為就是一個人。”

這里就發生兩個問題：什麼是獨立思考？這些算不算獨立思考？

鯨魚有魚的某些表征，蝙蝠有鳥的某些表征，但有魚或鳥的某些表征還不一定就是魚或鳥。獨立思考的人也有某些表征，但僅有這些表征卻不一定是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的人常常是不苟同別人的意見的；可是，不同意別人的意見就是獨立思考嗎？——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獨立思考的人常常是能夠拿出自己的看法

来的；可是，能够拿出自己的看法就是独立思考吗？——也许是，但不一定是。

問題在于找出“独立思考”的實質。独立思考不是盲从附和，但也不是故意抬扛。独立思考是一种尊重理性的客观的做學問或想問題的態度。独立思考的人遇到一事情，一種意見，總要問個“為什麼？”總要用自己的大腦想一想。想了之後，認為對的，就接受；認為不對的，就反對；想不通的，就保留。但不論接受也好，反對也好，保留也好，都是通過自己的大腦的。只要是真正用過心思，即使同意了一個普通人的意見，那也是独立思考，不是隨聲附和；而只要是沒有真正用過心思，即使反對了一個權威人士的意見，那也就是盲目反對，不是独立思考。

如果有人很虛心學習書本知識，虛心向老師講教，虛心同同學討論，這是不是不算独立思考呢？我們的回答是：這未必就不是独立思考。不管多麼偉大的具有獨創性的思想家，也不能“獨立”于前代的文化成就之外，“獨立”于人类的知識之外；他必須努力學習，吸收別人研究出來的有價值的成果，在這個基礎上提供自己的創造。因此独立思考不但不排斥虛心學習，而且只有虛心學習的人才能更好地独立思考。當然，所謂“虛心”，並不是腦子裡空空洞洞，只持拿書本上的知識往里填。在學習的時候，還是要用自己的理性來研究、分析和判斷的。

只要抓住“独立思考”的實質，那麼，不管在形式上表現為反駁權威意見也好，虛心學習也好，都是独立思考。正如只要具有哺乳動物的本質特征，不管是在水里游的鯨魚也好，空中飛的蝙蝠也好，都是哺乳動物。

去年國際上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果只看形式而不看實質，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眼睛的。匈牙利的十月事件的性質是革命還是反革命？不管反革命分子如何利用了人民群眾的不滿，如何採用了一些巧妙的形式，這次事件的實質仍然是反革命。蘇聯幫助匈牙利鎮壓反革命和英法侵略埃及，這也完全是兩回事，性質根本不同。像這一類問題，如果不分析實質，是會把根本不同的事情混淆在一起的。

資產階級民主儘管在形式上顯得好像是“全民的”民主，在形式上規定了全體人民的平等自由，可是它在實質上仍然是資產階級專政。為什麼這樣說？理由就在歸根結蒂資產階級的国家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保護私有財產和剝削制度，保護階級對階級的剝削的。我們當然要看到這種民主的形式，可是千萬不要因此忘掉了它的階級內容，忘掉了它的實質。

像這一類的例子，可以說要多少有多少。嚴肅和呆板，活潑和輕浮，勇敢和魯莽，謹慎和胆怯，慷慨

和奢侈，節儉和吝嗇，驕傲和自信，謙虛和自卑，交幾個知心朋友和搞小集團，靈活性和無原則性，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所有這一切，在形式上都是容易混淆的，可是在實質上都是根本不同的。

人們在認識上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把這些形式上相似而實質上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如果翻閱一下過去的“中國青年”，其中談到思想認識問題的文章，幾乎都要或多或少地接觸到這樣一個思想問題。講到嚴肅，總要把它同呆板、拘謹區別開來；講到活潑，總要把它同輕佻浮躁區別開來……當然，嚴肅性首先是和無原則性、輕浮不同的，其次才是和呆板、拘謹不同的。不過，前一種不同，是容易識別的，後一種不同，是不容易識別的。一個人如果只懂得嚴肅性和無原則性、輕浮的不同，那還不夠，他還應該進一步懂得嚴肅性和呆板、拘謹的不同。所謂“不要從形式上看問題”，“不要只看事情的表面”，這些話的意思也是叫我們看事物要抓住實質，光看表面形式是會犯錯誤的。

怎樣才能抓住事物的實質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事物的本質特征。每一種事物都有許多特征，其中有些是不重要的，沒有這些特征，並不妨礙這個事物之所以為這個事物；另外有的特征是根本的，失去這種特征，這個事物就不是這個事物了。譬如我面前有一個杯子（指一般喝水用的杯子），這個杯子有一些特征：它是白色的，瓷做的，圓口形的，有柄的。這些是不是杯子的本質的東西呢？我想不是。說它是白的，白色却不是它的本質特征，因為杯子並不一定非是白的不可。說杯子是瓷的，那麼玻璃做的就不是杯子了嗎？圓口當然是杯子的一種普通形式，可是如果把杯子口做成方形，我們也不能說它就不是杯子。至于有柄無柄，那和杯子是不是杯子也是沒有關係的。那麼，什麼是杯子的最本質的東西呢？什麼決定它是杯子而不是別的東西呢？我想，杯子之所以是杯子，就因為它是喝水的用具。它不是用來喝湯吃飯的，同碗不一樣；也不是用來貯藏水的，同水壺不一樣。喝水的用具，這是杯子特有的目的，也是杯子的本質。這個本質決定了杯子的基本形式。（如它必須是一個盛水的容器，它的容積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它必須便于用手端起來，等等。）只要它是喝水的用具，只要它的形式具備了這個條件，那麼，不管它是白的也好，綠的也好，透明的也好，瓷的也好，玻璃的也好，有柄的也好，無柄的也好，圓的也好，其他形狀的也好，它都是杯子。只要它不是喝水的用具，儘管它的外形有些像杯子，它仍然不是杯子。（例如瓷筆筒雖然像杯子，但不能說它是杯子。）這里說的是杯子，但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类推。

當然，我也不是說形式就根本不重要，可以完全不

“大張着眼睛”

讀書隨感錄之一

蕭也牧

我有個搞寫作的朋友，他曾經跑過不少地方，經常到農村里去體驗生活。大約就在前年冬天吧，他才從鄉下回來，找我來談天。他給我整整談了一宿農村里的新氣象：什麼農村里的姑娘都穿上了花衣服啦，小伙子們的衣兜上都插上自來水筆啦，不少人買了手電筒啦，幾乎家家都有了熱水瓶啦……有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實行了星期日休息的制度，一到星期日，人們都打扮得整齊齊齊，唱歌跳舞，串親訪友……有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了秋收分紅的時候，還舉行全社大會餐……在我這個長期沒到過農村的人，聽了他那有聲有色的插話，情緒上很受感染，十分興奮。後來他把所談的種種，分別寫成文章發表了。讀者讀了他的文章，大約也會和我一樣感到興奮。不久，我也到農村里跑了十來天，確實也看到了美乎他所說的事。

很久沒有和那位朋友通訊，不知道他又上哪裏去體驗生活了。前天，他來了，又和我整整談了一宿。他的神色依然是那樣的激動，談吐依然是那樣有聲有色，所不同的，只是所談的內容和他在兩年多前那宿所談的，區別竟然是這樣的！

他談到了在農村日常生活里的種種困難：過年買不到肉，油不夠，麥子不夠，農民平時花個零錢很困難……諸如此類。接着他聲色俱厲地批評了我們的通訊、特寫、小說以及影片中“粉飾生活”的現象。他

順便還給我講了幾個笑話：某報的攝影記者，為了拍照，硬讓姑娘們穿了花衣服去割麥子……據說這都是受了“無神突論”的影響，給讀者帶來了數不盡的坏处，並且聲言他今後專門要寫“干預生活”的作品了。（他所說的“干預生活”，是指要充分去寫在我們生活中存在着的困難，批判我們生活中的落後現象。）

我並不懷疑他底誠實。只是覺得：若有位讀過他兩年前所寫的作品的人，又讀了他行將寫出來的那類“干預生活”的作品，恐怕也會像我那樣感到惘然的吧？相信兩年前的他呢？還是相信今天的他？到底哪一種話更可信任一些？

隨即便我想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作家尤利烏斯·伏契克的那本關於蘇聯的特寫集：“在我們的明天已經變成了昨天的國家里”。這本特寫集，是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所寫的都是一九三〇年以前他在蘇聯所看到的事。其時正值蘇聯人民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的時期。

在這本特寫集里，有篇文章叫“大張着眼睛”，作者毫無顧慮地寫出了在當時蘇聯人民生活中存在着的種種困難。有人問他：“同志，你看到過商店門前的行列嗎？看到過排隊領口糧的人們的長蛇陣嗎？”他說：“是的！”“你看到過一家老小都擠在邊邊的陋室茅舍，黑漆漆的半地下室住宅，舊火車廂做的住房，冬冷夏熱的木板房嗎？”他說：“是的！”除了食、衣、住，他還寫到日常生活中其他的種種困難：釘子不夠，肥皂不夠，紙張不夠，火柴不夠……以至理髮也成了“危機”，“我走進了一家合作社理髮館去修面。……顧客們坐在搖搖擺擺的椅子上，背靠着牆，等待着——顧客眾多。這是‘理髮危機’。在這一伙人耐心地等上一兩個鐘頭，狹窄的和磨到不可思議的地步的剃刀才能又快又乾淨地把你的面修好，剃刀就像一根小鋼索似的

管它。只看形式是錯誤的，完全不看形式也是錯誤的。只看形式就是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地看形式是會把鯨魚當成魚，蝙蝠當成鳥的；可是完全不看形式，那麼我們也決不會知道鯨魚和蝙蝠是什麼。我們判定鯨魚和蝙蝠是哺乳動物，不是也根據它們的身體構造形態來看嗎？有的形式是不重要的，有的形式是重要的（這種形式通常是和實質有關的，是表現實質的）；有時形式是重要的，有時形式是不重要的；在一定的限度內形式是不重要的，超過這個限度形式又是重要的。杯子儘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是這些形式總得服從於它的用途（便于喝水）；如果有人想製造一個杯子，但竟然是沒有底底的，我們就不能說這是無關重要的形式問題，因為它就不能用來喝水了，就不是杯子了。再舉例說，有些人工作學習還好，同時也注意自己的衣著整潔，就自己力之所及做了一兩套好衣服，我們當然不能因

此斷定，這些人有資產階級思想；但是如果這些人超過了當前人民生活的水平和個人的經濟條件，一味講究打扮得豪華闊氣，或者一味追求個人物質生活享受，我們就不能說，“這只是形式，和他們的思想實質無關”。相反，倒可以肯定說，他們至少是沾染上資產階級習氣了。又如独立思考的人雖然不一定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表現出有自己的意見，可是如果有人每一個問題上都沒有自己的意見，那他也一定是獨立思考的人。

我這篇文章，只是借幾個例子來說明一個一般的思想方法上的問題。所以，我希望讀者不要停留在幾個例子上面。舉什麼例子，在這裡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於：以後在遇到這一類問題的時候，要注意防止觀念的混淆，不要把事物的若干表面的特征當成本質，而把這個事物同其他實質不同而在表面特征上有若干相似處的事物混淆起來。

在你的腦中刺刺作响。”“这把剃刀已經給顧客服务了七年，但新的剃刀还是沒有。”

然而，这决不是一篇什么所謂“專門”暴露落后現象和困难的文章！他在描写这种困难的同時，也写了困难的性質——所以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这一切困难的产生，正是为了要从根本上去消灭貧困，因而必須集中力量来建設重工業，从而提高工、农業的生产力，这才能逐步滿足人民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正因为理解困难的性質，也就看到了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事物。紙張不够。但是“報紙和杂志出版的份數，最近五年來增加到十二倍。”而巴拉赫納的造紙联合工厂，在不久以前才开始投入生产。釘子不够，“但是在薩拉托夫，康拜因工厂正在兴建。康拜因将会在国营农場和集体农庄的千百万公頃的土地上进行收割。”火柴不够。“但是在馬格尼托哥尔斯克新的巨大的高爐燃起了火……”其时，德森泊水电站正在兴建，建設規模建立了新的安加拉水电站的设计業已完成，克里木建立了新的冶金企業，頓巴斯正在兴建最大的矿井……这时农村中，“誰战胜誰”的問題已經解决了，农業产量逐年增高。那么这种困难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質的困难呢？讀者自然会理解到：日常生活中所存在着种种困难和当时已經所获得成績比較起来，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伏契克就是这样来看待当时苏联人民日常生活中所存在着困难的。他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苏埃埃国家的缺乏現象——这不是冻得发抖的穷人背瘦如柴的身上的破衣褸衫。这是小孩子身上的衣服，他撑破了衣服成長了起来。你看他：新脚高过双膝，衣袖窄小，袖口齐肘……喂，小伙子，事不妙呵！你身上的一切就要破裂，你撑破你的衣服成長了起来……

但是……

但是你在怎样成長呵！你是在怎样日益強壯有力，你是多么健壯、魁偉的小伙子呵！你是已經不再是小孩子，你已經是成年人了！

在他身上已看不到瘦小的膀子和短小的上衣，看到的只是年輕力壯的身姿，寬闊的胸脯和結实的双腿。

这也正如斯大林所說过的：“这里說的是我們的困难具有特殊的性質。这里說的是我們的困难并非衰落过程中的困难或停滯情况中的困难，而是增長过程中的困难，高漲过程中的困难，向前进展过程中的困难。”

当尤利烏斯·伏契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苏联正处在困难之中。我們的敌人正利用这种困难，嘲笑、污蔑、中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得一些糊涂的朋友犹疑，好心腸的朋友耽心，以致不敢向人民道出困难的真相。而伏契克这位共产主义者，这位苏联亲密的朋友，根据事实，以他的勇敢和明智，道明了困难的真相，指出了困难性質，以滿腔的热情歌颂

了正在奋不顾身向困难进军的人們。文成之日，高今已有二十六年，但是看来墨迹犹新，对于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我国讀者，仍然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

当时苏联人民日常生活中所有过的困难，和我国人民今天日常生活中所存在着困难相比較，困难的程度不完全相同，但是困难的性質完全是一样的。如果我們也像伏契克似的“大張着眼睛”看看，看到困难的同时，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在从事工業建設？几年来，我們建設了多少工厂？多少矿山？修了多少铁路？多少水庫？这在以往任何年代肯定是連做梦也夢不見的！

去年，我国有不少地方遭到了灾荒，但是饿食却增产了二百多亿斤，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去年不少地方遭到了灾荒，但是没有一个餓死的人！这也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不論是城市 不論是乡村，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今天，我們固然难免常常要排队买东西，但是，买到的是肉，是炒花生，是板栗，是划船票……这和解放以前反动派統治的时期，物价一日三漲，到半夜放上鋪蓋去排队买“混合面”时的心境比一比，大約总是不会一样的吧？

回头想想我的那位朋友前后兩次和我所談的話，难免有些耽心了。他到处走，看到的事物确实不少，为什么單單就看不到我們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主要的、本質的現象呢？为什么看不到我們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呢？是什么灰塵蒙住了他的心眼？致使他不能“大張着眼睛”来看生活？二年前，当他兴高采烈大談并且大写其农村新气象的时候，那时，在我們的生活里，并不是沒有困难，只是他看不见，或是看见了沒有勇气說出来，因为他不理解困难的性質；甚至他对当时他所津津乐道的种种“新气象”，恐怕也未必真懂。类乎“大会餐”、“星期休假”之类的事，正是一种不正常的現象，大可不必加以渲染成文，倒是应该指摘的。讀者讀了他的文章，效果恐怕是不会好的。确乎应该作为一个教訓来看。当他今天声嘶力竭地声言：今后專門要找生活中的困难，專門要写“干預生活”的作品的时候，很需要好好想想这些困难的性質——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否则写出文章来恐怕就更不妙了！不理解生活，就看不到生活里边主要的东西，这就叫作“偏”，叫作歪曲生活，也就“干預”不了“生活”！在生活中，应该多看看，多想想，看得全面一些，否则就会变成“瞎子摸象”；就会变成“籠头草”，偶尔吹来一陣微風，也会变成东奔西倒，永远长不出脊梁骨来，自然不能直起腰来看生活。这不仅值得我那位朋友注意，也值得我們大家注意的。全面地看生活，“大張着眼睛”看生活！

尊師是共產主義美德

丁 華

幾千年來，“尊師”是我國人民的優良道德傳統。在我國人民中間，學生一向是把教師當作長輩來尊敬的。顏淵是孔子的學生，他對待孔子如同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孔子說：“回（即顏淵）也，視予（我的意思）猶父也。”我國學生通常稱呼教師的妻子為“師母”，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民間，青年人結婚時，他的老師按例被尊推坐在賓席首位。這種優良的傳統，我們應該繼承下來，豐富我們共產主義道德的內容。

解放以來，在青年學生中間，尊敬教師、熱愛教師的風氣基本上是濃厚的，師生關係一般是密切的。絕大多數的青年學生，懂得尊敬教師的勞動，向教師虛心請教；懂得對教師應該有禮貌，關懷教師的生活。在這方面，動人的例子是很多的。前不久，北京大學教授段學復先生胃潰出血，失血過多，幾十個學生爭着為他輸血。師生的血液流在一起了，這不正是十分感人地說明了新型的師生關係嗎？

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的青年學生在對待教師的態度上都已經沒有缺點了。事實說明，還有一些學生不尊敬教師，採取種種錯誤的，甚至是粗暴的態度來對待教師。

有的學生不恰當地強調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以為“獨立思考”就是自己“鑽研”，可以不再需要教師了；因此，不虛心向教師學習，有的甚至對教師所講的，無根據地懷疑，表現出一種傲慢的態度。有一個大學生在課堂上和教師爭辯說，司馬遷和司馬光是一個人，教師根據歷史事實指出他的錯誤後，他還是說：“不，我認為就是一個人。”有的學生為了“培養”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專門注意挑教師講課中的某些毛病。

有的學生脫離了我國當前科學文化水平，忽略了我們師資嚴重不足的情況，對教師的要求往往過高，不夠实事求是。當他們的要求不能達到的時候，就表現出一種急躁的情緒，對有些他們認為不行的教師，特別是對年輕的教師（高等學校的助教和中等學校的新教師），很不尊重，個別學生甚至發展到狂妄的程度。有一個大學生在課堂上給教師遞條子，上面寫道：“你教的很枯燥，再學兩年再來吧！”另一個大學生在課堂上竟公然粗魯地對教師說：“你講得太膚淺，太不系統。”

在日常生活中心，不少學生對教師缺乏最基本的禮

貌。有的人在路上遇見了教師不打招呼，揚長而過。有的人在進出口、上下樓梯的時候，看見教師來了，也不讓一讓，橫沖直撞，前後推擠。有的人坐着和教師說話，教師反而站着。有的人對教師直呼其名，叫助教是“小助教”，有的干脆什麼也不叫，只是“喂，喂！”這裡舉兩個例子：某高等學校一批師生出去實習回來，在火車站等汽車接回學校，因為汽車少，不能一次走完；令人奇怪的是，竟沒有一個學生想到應當讓教師先走，反而一擁而上，把教師丟在一邊。有一位教師身體不好，坐到駕駛室裏去，又有一個學生擠進去，但是駕駛室只能坐一個人，教師說：“我身體不好。”學生却說：“我也不舒服。”結果教師無法只好下來。有一個中學生，把罵人的字條貼在教師的背上，在場的学生不僅不加以制止，反而哄堂大笑。這兩個例子雖然是極其個別的，但是，它說明了在我們的國家裏，還有個別的青年學生對教師是這樣的無禮，還有個別的重度尊師的風氣是這樣的淡薄！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嚴重的注意和正當的指責。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現象呢？我認為，主要是因為，那些不尊敬教師的學生在認識上有幾個問題沒有弄清楚，有必要在這裡談一談。

在舊社會裏，由於統治階級的歧視，有些人是看不起教師這一種職業的，說什麼“家有三斗糧，不做孩子王”，把教師叫做“教書匠”。這是對教師的極其不公正的看待。這種對教師勞動的鄙視，直到現在還影響着部分青年學生對教師的看法。

今天，我們應該給教師公正的評價。列寧說：“應當把我國國民教師的地位提升到資產階級社會的教師們所始終不能達到的高度上。”（“日記摘錄”），在人類進步的歷史中，教師承擔了一部分傳遞科學文化火把的任務。人類的科學文化、勞動經驗所以能夠不斷積累，流傳至今，教師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勞。新的一代青年學生，每一個人所獲得的知識中，都包含了教師勞動的成果。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教師担负了更加重要的任務。他們的勞動是為了把祖國的下一代培養成品質高尚、聰明能干、勤勞勇敢的人，教給他們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必須具備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實踐的本領。在某種意義上說，國家和人民把自己的希望和未來托付給教師們了。像其他任何為社會主義服務的

劳动一样，教师的劳动应当受到尊敬。而学生是直接获得教师劳动成果的人，就更应该尊敬教师的劳动。

我們提倡学生要独立思考，絕不能因此低估了教师在青年学生學習中的指导作用。独立思考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無师自通”，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沒有科学的材料和必須的知識基础作为依据，独立思考只能是毫無根据的玄想，就会鬧笑话，把司馬迁和司馬光說成是一个人。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向教师請教和独立思考是統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教师在学生的學習中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但并不能要求教师是万能的，能够解釋和回答学生所提出的一切問題。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教育事業發展的很快，增加了大批的教师。有的新教师，年紀比較輕，离开学校不久，知識还不够充实丰富，教学經驗不多。这就需要学生更好地和他們合作，共同搞好教学。不应该因此就看不起他們，也不要还没有真正了解教师所講的課程內容，就認為没有什么。有这种自滿情緒的人，在學習的道路上总是会跌跌的。何况，有些学生認為沒有多大學問的教师，不見得真是沒有學問。要时时記住毛主席的教导：“知識的問題是一个科学問題，來不得半点的虛伪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态度。”（“實踐論”）当然，我不是說，对教师請課內容有意見也不能提了；有意見是可以提的，但是應該注意通過适当的方式，在一定的場合提出來，而不要采取簡單、粗魯的做法。

尊敬教师是我們人与人之间應該有的禮貌。表现了社会主义社會中人与人之间出自内心的友愛、关怀和彼此尊重。这不是什么小節，也不是什么形式，而是我国青年所必須具备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質。



跳 月

夏 国 云

蔚藍的天空密布星辰，
嫩綠的草地圍滿人群，
一輪明月當空照耀，
照耀着跳月的青年寒民。

小伙子搖起大三弦，
姑娘們舞動花衣裙，
表露愛情的歌聲呵，飛入白雲，
白雲下出現一隊巡邏兵。

“大軍哥，請來跳月吧！
你來了，我們會跳得更高興，
大軍哥，請來跳月吧！”

大三弦也在把你們歡迎。”

“我們戎裝在身，肩負使命，
多謝諸位的盛情。
朋友們，快樂地跳吧！
我們還要去巡邏邊境。”

天藍得像大海樣的透明，
巡邏兵揚鞭馳進叢林，
小伙子們搖起奔放的三弦，
伴奏着馬蹄遠去的聲音。

1956年10月，雲南下夕
（賈亞中插圖）



对教师 and 年長的人要有禮貌，要尊敬他們，不仅因為他們已經和正在对社会做出貢獻；而且会对教师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会加强教师們的責任感，充分發揮他們的劳动热情。有的学生对教师不尊敬，往往使他們感到“寒心”，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要知道，教师劳动的最大報酬，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勤奮好學，日益成長；教师的最大安慰，是自己的学生尊敬他們，关怀他們。

我相信，那些对教师还不够尊重的同學們，只要向他們說清楚道理，是会改正缺點的。

向學生进行尊師教育，是共

主义道德品質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希望学校行政及青年团組織能經常給以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希望教师們把向學生进行尊師教育看成是自己的責任；不要看到某些不尊敬教师的現象而感到灰心，便放棄了对學生教誨的責任。正因为青年學生在尊師这一点上存在着缺點，就更需要教师的帮助。

社会上需要形成尊師的輿論，批評、指責那些不尊敬教师的言論和行為。

只要大家注意這個問題，那麼，尊師就一定成为社会上的普遍風氣，一定会成为青年學生的一條行動准則。



伍化整为零，我跟着宣传队一起走，在夜晚黑黝黝的高粱地里，在潮湿窒息的地洞内，我们还轻轻地哼着，有时是几乎在心里默默地唱着：

“我们是八路军， 我们是一家人，
战斗在一起， 生活永不分。
同生死， 共患难，
.....”

这时候，我们女同志有的几乎掉下眼泪来。也许有人会说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不，他不了解！当我们猛地抹去眼泪，我们的心里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力量。以后，在国庆节游行当我初次走向天安门广场，挥舞着手中的花束，唱起那“歌唱祖国”雄偉而又高亢的歌时，我也不禁会想起那艰苦、困难斗争的年代，在我欢乐的歌声中，脸上也同时会閃爍着欢乐的晶瑩的泪珠，它激起我的感情是复杂的。

作为一个有我自己切身体验的人，我是多么感谢那些音乐家所给予我的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歌和人民群众之间，有着深切的感情的联系，也许你不相信，可我是经历过这样的事，现在，我就一点也不夸张的讲给你们听听吧！

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最初是在新四军的连队里当文化教员。可我是个广东人，一口广东官话，战士们都听不懂。我心里挺别扭，也着急。

连队驻扎在离村庄不远的山沟里，连绵不断的秀挺的竹林夹着一条小溪和青石板铺成的小道直通村子里。我在空闲或工作苦闷的时候，常喜欢独自到这里来坐坐，想想办法。有时也轻轻地哼着我喜爱的几个歌子，有时索性大声高唱起来。

于是，在一次文化课上，战士们就提出了要求：“余同志，你还是在教我们唱个歌吧！”

我正在为难，战士们却都鼓掌来了，齐声嚷着，“欢迎……欢迎……”

“好！”我能说什么呢，不如干脆答应了。

这以后，一个、两个、三个……新学会的歌在全连都唱起来了。说也奇怪，我和战士们关系很快就改变了，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呆板和生疏了，我发现战士们是那样愿意来亲近我，同时，我也觉得我的生活和感情也开始真正和连队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了。

过不多久，上级来了解我的工作情况，指导员把我喊了去，我担心要被批评了。可是当上级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时，指导员却插嘴说：“小鬼干得不错，战士们都喜欢她！”忽然，指导员又狡黠地眨一下眼，把脑袋一偏，朝窗外一努嘴，“你听——”

二排的战士，正从青石板路上走来，他们扛着柴禾，一路走着，一路高声唱着。

从小，我喜欢唱歌；现在，我是一个专业文工团的一名正式歌手。对我来说，歌，已成为我生活中主要的东西。在我这短短三十多年的经历中，已经积累了、学会了不少各个时期的歌子。

我不清楚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只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在那古老而骛骛的城隍里，我穿着一件黑色打补丁的上衣，光着脚丫，流着鼻涕，和那家的孩子们一起，肩上扛着短毛竹杆，在黄昏时狭窄的街道上，威风凛凛地，用那不合节拍的调子一遍又一遍地唱着：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当我们唱到“齐欢唱”一句的时候，我们兴气活现地高举短毛竹杆，像一个指挥员挥舞着他手中的刀马刀似的。

那时，我不明白什么东西叫“列强”，什么东西是“军阀”，反正当时大家都唱，我跟着也就学会了。

我就那样跟着别人唱唱，学着别人哼哼，从此，学会了不少歌子。

人们说，“歌，是时代的号角！”的确是。假如你有体验的话，当你唱起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流行最远最广的歌曲的时候，那个时期的全部生活面貌，就会重新呈现在你面前。直到今天，有时当我轻轻地哼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首有名的“大刀歌”时，我的整个心情，就仿佛又飞到了那抗日战争开始的年代，那种敌愾同仇、慷慨激昂、奋勇向前的情緒，立刻又会使我激动起来。

人们也说，“歌，是力量！”也的确是。假如你能领会的话，你完全会信服。以后，我参加了革命，走过很多地方。当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唱着“游击队之歌”向太行山里撤退，那时我是多么坚定地相信着，如歌词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人民队伍；在敌人“五一”大扫荡时，我还是队伍里的小鬼，敌人铁壁合围，我们的队

我臉漲得緋紅，窘羞極了：就是教了几个歌，有什么可以值得稱贊的呢！

不久，我被調到團部去工作了。戰士們知道了都不放我走，我也舍不得離開他們。臨走那天，那難舍難離的感情，正像我以後送我愛人南下進軍時一樣。戰士們替我扛着背包，一直送我到團部溝口。我像有很多話要說，可又說不出來，最後，我接過背包站住，我說：“我們一起唱個歌吧！”

“好，唱什麼？”

“新四軍軍歌！”

在溪畔的竹林里，我們站得整齊齊地唱完了歌，就握手分別了。

但就在那年冬天的一個傍晚，團部突然接到了“皖南事變”的情況。我們因為离司令部較遠，當接到轉移的命令時敵人已經圍到离我們只有十里來地的土橋嶺附近，並且兩翼已經包圍了我們。我們只好分散突圍，團政委讓我和通訊班的戰士一起走。

我跟着通訊班按着指定的方向，向山里轉移，白天隱蔽，晚上走。

一天晚上，我們翻越鳳凰嶺的時候，突然迷失了方向。山上山下，一片漆黑，只有靠山脚的一小塊地方，露出一星微弱的光亮，我們就朝着那絲光亮撲下山來。前面是一座不大的村庄，光亮就是从村口的一座竹棚中透出來的。

當我們順着光亮走近這家竹棚時，里面的燈突然一下子熄滅了。四周黑沉沉的，天上連一顆星星也沒有，風吹着竹林刷刷直响，看样子似乎要下雨了。

我們靠着籬笆站了一會兒，班長給我做了個手勢，我就摸黑走上石階，推了推門，門關得嚴嚴的。我輕輕地拍了几下，低聲向里喊着：“老乡，老乡。”

竹棚里似乎有个人在黑暗中碰翻了个瓦罐，里面“咣啷”一响，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靠近門縫往里瞧瞧，什么也看不见，我繼續喊着：“老乡，不要害怕，我們是新四軍！”

屋里沒有回答。

“老乡，老乡，我們是真正的新四軍。不要害怕！”

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我無可奈何地轉回身去，戰士們都緊緊地圍在我跟前。這時，我突然聽見屋里有一陣細碎的鏗鏘鏘的聲音，接着，我似乎感到有一个人挪近門口，從門縫里在向外面窺探我們。我急忙東聲柔氣地喊了几聲：“老乡，開開門吧！我們是……”

我還沒說完，里面終於有人答話了，是一個老年婦女蒼涼的聲音：“同……新四軍早走了！”

班長連忙接上去說：“我們是突圍出來的，走錯了道。”

屋里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我們聽見里面噤噤喳喳地好像有兩個人交頭接耳商議什麼。我們警惕起來了，閃開門口，立刻把槍掏了出來。

突然，我們又聽見那老大娘疑疑惑惑的聲音，“誰知道你們是干什么來的！”

我們的班長可有點不耐煩了，把匣子槍在手裏一拍，粗聲粗氣地回答：“啊呀！老大娘，我們就是新四軍，這還能騙人嗎？”

“要是新四軍……”老大娘說了一半就停住了，我們又聽見屋里噤噤喳喳了好一陣後，老大娘才接着往下說，不過這回的聲音可柔和多了：“好吧，你們給我唱個歌——新四軍的歌。”

“行啊！”我回答着，心里開始豁朗起來了。同志們一個個都擠在我跟前，我給大家做了個手勢，低低地說着：“來，同志們！我們唱吧！”

我們十几個人，緊緊地擠在竹棚子的門口，開始輕輕地、嚴肅地唱起我們心愛的歌子：

光榮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們的姓名；

孤軍奮鬥羅霄山上，

繼承了先烈的殊勳。

.....

黑暗濃密地裹着我們，我們彼此都看不清，但從我們心的深處所吐出的熱氣，像匯成一個光明的火把，在我眼前高高舉起。

我盡量使我唱得準確而合拍，我將我對生活全部的感情交織在今晚這歌聲里。我唱着，剛才那種爬山越嶺、飢渴疲憊的痛苦，似乎都成為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唱着，在我眼前，出現了一種壯麗而嚴肅的生活；我唱着，感到整個大地在我腳下顫動着，在給我們作着無聲的伴奏。

我們的歌聲穿過了這濃密的黑暗，打破了這村庄的靜寂。突然，附近幾家竹棚子里，燈光都亮起來了，昏黃的光綫一道又一道地斜射在凹凸不平的青石子上，投進蔥郁的樹林子里。慢慢地竹棚子的門，也一扇一扇地輕輕地打開了，立刻一大片燈光灑到我們身上，我轉過身去，面向着老大娘家的大門，繼續唱着：

千百次抗爭，

風雪飢寒。

千萬里轉戰，

劈山削骨。

.....

門“呀——”地一聲敞開了，老大娘撲出來，伏



在我身上，緊緊地摟着我，眼淚從她凹進去的眼眶中直滾下來。她一面大聲地向屋裏喊着，“因呀！還不快點上燈！”一面攙扶着我，連連地說：“快進屋歇歇，快進屋歇歇……”

我和班長扶着老大娘進屋去，老大娘還一直重復地絮叨着，“同志們！對不起啊！真對不起啊！……”

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在鍋台上點着了燈，又添了幾根燈草進去，把燈火撥得旺旺地。然後，點着了一把柴火，塞進灶膛里，給我們燒水。

這時，院子裏傳來了腳步聲，咳嗽聲，遠近的老鄉們都陸續地走進屋子裏來了，他們有的抱着柴火，有的捧着干菜，有的拿着腳盆；親熱地拉着戰士們的手，端詳着戰士們的全身上下：

“同志，叫你們受委屈啦！”

“同志們，實在對不起得很。”

屋子裏燈火通明，洋溢着一種親熱、和睦、鬧哄哄的氣氛，班長向老鄉們打听着這一帶的情況。

我蹲在老大娘身旁，老大娘開始給我講着就在不久幾天前發生的一件事：也是在昏黑的夜晚，村里闖進來一股國民黨匪軍，他們冒充新四軍，又搶東西又拉伏，把個村子上上下下糟塌個夠了才走。從此，老鄉們可提防得緊了，怕再上當受騙。

老大娘一面講着，一面有節奏地“呼搭，呼搭”抽着風箱。灶膛里的火一旺一熄，一明一暗地照着老大娘那慈祥的面孔，我望着她那臉上布滿着的蛛網似的皺紋，那和藹的眼睛，感到那麼熟悉，就像回到了我多年不見的媽媽身旁一樣。

老大娘一手摟着我的肩膀，自嘲似地微笑了一下，然後停住了手，默默地望着灶膛里的火，又像是又我講，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道：“真是的，革命的歌，只有關革命的同志才唱得準頭。”

灶膛里的柴火燒得噼剝响，我全身被熱氣燒得懶洋洋的，就依着老大娘的膝頭睡着了。

第二天傍晚，我們才離開這村庄，去追趕大部隊。老大娘戀戀不舍地牽着我的手，送到村口溪邊的小橋旁。

從那時到現在，十五個年頭過去了。生活豐富了我，我不但喜愛唱歌，而且我還想編歌。我總想自己編一首歌：這首歌要唱出我們革命鬥爭的道路，唱出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氣魄；唱出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唱出我們的過去；唱出我們的現在，也唱出我們美好而幸福的將來。我多少懂得一點作曲的道理，我知道要一下子包括那樣多的內容是不行的。可是，我那種想盡情歌唱的感情，在我心中一天一天地在上漲，一天更甚一天地汹涌澎湃着。

(李國璋插圖)

新語林

俄羅斯民諺

鳥美的是羽毛，人美的是學問。

* * *

趕兩隻兔子的，一隻都捉不到。

* * *

愛學習的是聰明人，喜歡指教人的是蠢才。

* * *

羊羣和睦，狼不敢捉。

* * *

別看是黑色的牛，可是有白色的奶。

* * *

別把敵人當羊，要把敵人當狼。

* * *

阿婆這東西雖然沒牙齒，

可是骨頭也會給它吃掉。

(永永譯自俄羅斯民諺)

到处都有我們的朋友(一)

——隨周總理訪東南亞所見

杜 槐

(一) 柬埔寨王国

(1956年11月22日—27日)

1956年11月18日，周總理離開北京，到東南亞各國進行友好訪問。

11月22日，周總理一行二十餘人到达了柬埔寨王国的首都金边。飞机降落后，第一个上前和客人握手的是西哈努克亲王。早在三天前，西哈努克亲王就在欢迎周总理的告民众书里说：“……我們国家將以極大的喜悅和光榮來迎接這次正式的訪問，……一個世界上極強大的國家的政府領袖，一個世界上聲譽最高的人物，給予我們的榮譽和訪問，明顯地証明了我國已在國際上處在一個優越的地位。”柬埔寨王国自上而下的確早就以友好期待的心情，等待着周總理的訪問了。

周總理和西哈努克親王坐着敞篷汽車，從飛機場去王宮。為了使所有的人都能參加歡迎的行列，金邊的商店都在這一天停止營業。人們站在強烈的太陽光下，爭看周總理的風采。柬埔寨人有着棕色的皮膚，面型有些像我國廣東省人，有些像馬來亞人。女子穿着白上衣和彩色繽紛的沙籠，中年和老年的婦女，多剪短頭，有些竟短如男子的平頭式。男人們有穿沙籠的，也有穿西裝的。

金邊是湄公河畔一座現代化的美麗城市，街道寬闊，房屋整齊。王宮位於市中心，周總理的住所，在王宮內院的一所精緻的樓房裡，隔着一條林蔭道與王宮正殿遙遙相對。入夜，整個王宮大院的樹上掛滿了彩色電燈。當晚，國王和王后舉行正式招待晚宴，王室的樂隊在廳外的草坪上奏着國王和親王作禮的音樂。宴會後，又舉行高棉古典舞蹈晚會。西哈努克親王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參加了演出。王后在一個星期前，就親自指導他們練習了。在王宮外面，上萬的群眾站在街頭上興奮地望着裏面的燈光。周總理在金邊期間，每晚都是如此，直到深更半夜才散去。

在柬埔寨五天的訪問期間，周總理和賀龍副總理率領隨行人員，訪問了王國首相、王國議會，參觀了學校和名勝古蹟，還訪問了磅湛、暹粒二省和磅清揚，到處都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國會主席在歡迎周總理的歡迎詞中的一段話，表明了柬埔寨人民的心情：“當高棉獨立之父——西哈努克親王訪問貴國時，那種隆重的歡迎儀式，和真誠的關切，使全高棉的人民無限感



國宴後，柬埔寨國王和王后陪同周總理步出大廳

動，和引為無上光榮。從那時起，我們時時刻刻等候閉下能蒞臨高棉訪問了……。人民應不會忘記的是，我們東中兩國歷史上的傳統關係，自從中世紀以來，是一直不斷地保持着聯繫，這種友誼也曾經受到殖民主義者的挑撥離間而蒙受到一些損害，但是由1955年底西哈努克親王爭取獨立的英勇的鬥爭而全部消除了。從今天起，為了維護世界和平，高棉王國願意堅決地和世界各國携起手來，尤以中國為始，不分膚色種族，無論政治路線，只要這些國家能尊重中立政策，不超越萬隆會議的範圍。中立政策是高棉全民的願望。……同時要使柬埔寨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只有當柬埔寨隨時隨地能努力維護世界的和平才能實現，因為人們絕不能在變亂中建設的。”整個旅程都是由西哈努克親王親自陪同的。有不少地方，他還親自擔任解說。

柬埔寨王國是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人口有四百多萬。國民經濟以農業為主，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土地富饒，風景美麗。我們從飛機往下望，只見一片綠油油的水田，茂密的森林，水塘和衆

草。土地多而尚未充分開發，稻田很少施肥，野草衆生也不鏟除，一年只收割一次。這與我國地少、深耕細作，南方一年種三次稻的情況完全不同。柬埔寨的主要產品是：大米、玉蜀黍、橡膠等，漁林業也占相當地位。我們在磅湛省參觀了柬埔寨橡膠園和製造工廠。它是法國人經營的。整個橡膠園、工廠和職工宿舍占地一萬二千公頃，面積比法國的首都巴黎還大。橡膠園和工廠擁有二百公里長的小運河，七百公里的運輸公路。法國經理和職員有着豪華的住宅、及游泳池等娛樂設備。1956年會出產各種膠製品一萬五萬噸，為法國資本帶來大量利潤。

獨立後，王國政府就計劃辦橡膠園合作社，由農民自己種植，發展民族橡膠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柬埔寨人民的生活，一般是十分簡單的：多半住在架在四根木柱上的木屋。由於天氣炎熱，衣着問題不大。貧苦的家庭連床鋪都沒有，也能過得去。

柬埔寨的工業還很薄弱，除農產品加工業外，有一些規模不大的手工業。日常用品，以外來貨為主。這說明了柬埔寨獨立之後，為什麼西哈努克親王那樣迫切地希望從事國內的經濟建設。柬埔寨的知識分子很關心中國的建設情況，幾位柬文日報的記者，向我們新聞工作者說，周總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他們已讀過不只一遍了。引起他們特別注意的是我們關於增加農業生產和改進耕作技術的政策和辦法。因為他們的人民絕大多數是農奴的。

柬埔寨有着悠久的文化傳統。人民信仰佛教，普遍以合十為禮。周總理和隨行人員被招待參觀了舉世聞名的吳哥古迹。吳哥是古代柬埔寨王朝的京城。這座九世紀和十二世紀的古城的遺迹，仍完整地保存至今。那裏有點將台、慶功的凱旋門、蛇神廟、國王和王后的紀念塚……。而吳哥窟維什努神的祭祠則為世界建築上的奇觀，令人贊嘆不已。在這座古祭祠的壁上、門上、在屋檐和房柱上，每一個角落都密密地雕滿了敘述古代王朝功績、神話、宗教故事的浮鏤和雕刻。吳哥古祭祠生動地說明了柬埔寨人民的藝術天才，勞動的毅力和宏偉的氣概。這樣的人民是充滿着潛力的人民！

柬埔寨到處都是華僑，總數約有三十多萬，占總人口三分之一。在金邊，三十萬人口中有十分之一是華僑；在南部買不省的居民幾乎全部是潮州華僑。華僑和柬埔寨人通婚的很多。我們遇到很多柬埔寨人，他們祖父一代有中國的血統。周總理問西哈努克親王談到華僑時，會問華僑是否遵守法令，尊重當地風俗習慣。西哈努克親王回答說：他們都能遵守王國法令，和當地人民相處很融洽。

在周總理到達前，桑云首相曾約華僑領袖去談話，通知他們政府將以國賓禮節隆重歡迎，華僑方面任何人都可參加歡迎。教育部還令華僑學校在周總理到達

那天放假一日。

周總理訪柬柬埔寨王國的消息傳出後，各省華僑紛紛成立籌備歡迎委員會和歡迎隊伍的總領隊部，積極準備歡迎“親人”的來到。親人——這是柬埔寨華僑對周總理的稱呼，他們絕大多數是在柬埔寨出生的，從未回過祖國。但是，他們熱愛和關懷祖國。在柬埔寨的華僑學校里，全都是用國語講課的。我們遇到的華僑很少不會講國語的。而在解放前一個不懂潮、穗話的人，是很難和他們交談的。

在離開柬埔寨的前夕，周總理假金邊國家大廈招待了華僑各界代表。周總理在會上勉勵華僑努力促進中柬友好關係，尊重當地的法律和風俗習慣。周總理指出華僑寄居在柬埔寨，有些最後會變為高棉的公民，這將使中柬兩國成為親戚，進一步促進兩國的友好關係。未成為高棉公民的，就不要從事政治活動。周總理希望華僑能夠參加柬埔寨的建設工作。他說新獨立的柬埔寨王國和中國一樣需要經濟獨立，急待發展工業。最後周總理要求華僑之間首先要做好團結的工作，進步的要做模範，不要藐視人落後，應該首先把友誼的手伸出來，有時要耐心的等待。

27日上午，中柬兩國在查亞羅皇宮簽署了兩國聯合公報，重申中柬友好，共同遵守和平共處五原則。

當天下午，周總理一行告別了柬埔寨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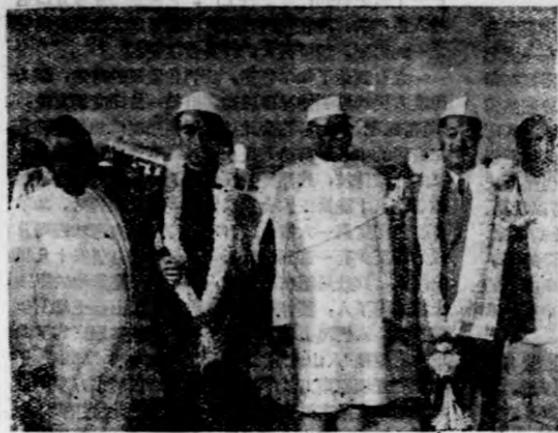
（二）印度共和國

（1956年11月28日——12月10日）

我們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傍晚，到達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尼赫魯總理與周總理——這兩位“潘查希拉”的創議人，又一次會面了。機場上到處是人群和鮮花，歡呼的聲音此起彼伏。

新德里是1912年建成的。總統府位於新德里城的中心；是一個用紅色的沙石和各種花崗石蓋成的、富有莫臥兒情調的建築。面積三百三十英畝；內有三百四十個房間，寬闊而高深的走廊；和一個十二英畝大的莫臥兒式的花園——它是新德里的一景。每逢百花盛開的季節，便開放給人民欣賞。總統府的兩側，是國會大廈和政府秘書大廈。從總統府正門一條筆直的、長達數英里的柏油大道，直達紀念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印度軍人的勝利門。馬路兩旁種植了整齊的樹木，還有公園似的人行道，和可以划船的人工小溪。在這之後，才是一排排的房屋。氣派很大。這年英國殖民者從東口岸加爾各答，遷都到這里。從地理上來看，它和孟買、卡拉奇、加爾各答的距離差不多相等。它又曾是過去印度王朝和回教王朝的所在地。過去有這樣說法，誰控制了德里誰就控制了印度。英帝國主義就在這個古代王朝旧址德里附近，找到了他們企圖長期統治印度的新德里城址。

周總理在到達德里的第二天，便訪問了正在開會的印度國會兩院。在休息的時候，議員們舉行茶會招



在馬德拉斯，印度主人以最崇高的民族禮節向周總理賀副總理致敬

待我們。他們紛紛包圍着中國的來客，親切地詢問中國的近況。他們想知道中國的人民代表是怎樣產生的，怎樣解決不識字人的秘密投票問題。他們還問起中國文字改革進行得如何了，有人說何不用梵文注音呢，它比拉丁字母更能準確地表達中國發音，而且又能標誌中印兩國深厚的友誼。婦女議員從中國婦女在人民代表大會所占的席位，一直問到中國的旗袍。人們還在談到一千多年前中國的法蘭克裝在印度的史迹。來過中國的議員，像老朋友一樣，特別高興，忙着給我們介紹朋友。……

在周總理訪印時，帝國主義者一直在散播周總理與尼赫魯總理存在着分歧，說“潘查希拉”枯萎了。周總理應邀在國會發表演說時指出：“中國和印度取得民族獨立的道路和方法是不完全相同的。……有人就企圖利用這種不同來證明中國和印度的友誼是沒有基礎的，或不能持久的。然而我們認為兩國人民完全可能從彼此不同的經驗中，吸收對自己有益的東西，從而來豐富自己的經驗，以求得各自的進步。”

尼赫魯總理在招待周總理的國宴上也說，如果印度國內的多样性仍然能夠保持一個國家統一的話，“那末，我們兩國之間儘管有了不一致的地方，而仍然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那就不值得惊奇了。”他說：“我們兩國接受了五項原則，這些原則明確地規定世界各國應一起前進！”

兩國的分歧，是友好的分歧。他們的一致是十億人民要求世界和平、團結的一致——帝國主義的造謠有什麼用呢？

十二月一日，周總理乘飛機去訪問靠近印度西海岸孟買的浦那市。浦那是一個恬靜而幽美的地方，街道整齊。印度朋友告訴我們：這裡的人有着英勇反抗外

來侵略者的事迹。這裡的名勝古蹟，不是宮殿寺廟，而是結在遠遠山坡上的一些古老的黃土碉堡。印度三軍軍事學院的院址選擇在這個地點，並非偶然。

周總理、賀副總理檢閱了軍事學院的畢業典禮操演。他們全部的操練和軍樂的音樂都是英國式的。我們又看了軍事學院教官表演印度傳統騎馬術。騎士們穿着印度民族服裝，飛馳在馬背上，手執鋼劍，一面吆喝，一面刺着路旁預先放好的各種障礙物。

浦那也是印度一個科學中心。在那裡我們參觀了製造配西林的化學研究所和中央水利研究站。中央水利研究站正在研究着印度全國控制河流，清除泥沙，發動水力，改進和發展河口港灣以及航行條件等四十多個具體問題。印度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生活在農村中，他們在帝國主義長期和野蠻的剝削下，受盡

了水旱災的磨折。像過去我們黃河有“中國的憂患”之稱；他們的柯西河，這個“柯西”就意味着“憂愁”。獨立之後，印度人民用極大的熱情努力從事駕馭河水的工作；使它們不再多災難；也不讓它們白白地流去，而是用來灌溉田園，和供給工業發電的力量。這種對“水”的關懷，是我們訪問南亞各國所見到的普遍現象。

二日，我們飛抵孟買。孟買是印度西海岸的大商埠。我們住的省督府靠近阿拉伯海，不時聽到海浪沖擊岸旁岩石的濤聲。入夜，環繞着孟買灣的岸邊燈光，形成一條美麗的半圓形——英國人過去稱它為女皇頭上的項鍊。今天這條項鍊已經歸還給它原來的主人了。

孟買是印度紡織業的中心，它的產品占全國百分之六十。我們參觀了在印度最早建立的紡織廠之一——亞地亞私營紡織廠。周總理從一個車間到另一個車間，仔細地觀察工人們操作的情況，看他們的成品，提出了關於投資、產量、銷路、機器設備、工廠管理以及工人待遇等許多問題；周總理還時常把得到的答復和中國的情況作比較，告訴印度朋友。印度朋友很喜歡這樣作法，認為可以交流經驗和增加了解。

四日，我們到了達買索爾省的都會班加羅。汽車把我們直接送到印度斯坦飛機製造工廠，我們參觀了裝配飛機和製造火車和公共汽車的部分。這家工廠現在為印度空軍生產完全由印度人設計的教練機。除引擎從英國進口以外，一切機件都能生產。

下午我們又連續參觀了兩個科學研究所。我是外行，對科學研究所不能介紹，但是從所參觀的科學規模，我們知道印度政府很重視這方面的工作。在孟買的時候，我們參觀了以印度巴巴博士為首的印度科學家們親自設計的原子反應堆，兩年內，印度將有三

个反应堆。

五日飞抵马德拉斯，这是印度南方东海岸重要的城市，那里的人民肤色较深，身材也较我们在印度北方城市甚至孟买所见到的矮小，面貌也全然不像在新德里所见的亚里安人种的轮廓，而是更具有亚洲热带人种的特色。公元前，亚里安人经过中亚细亚侵入印度，从北部赶走了原来的德莱维特种的土人。虽然经过长期的杂居、通婚，独立后全国已臻统一，但是历史上的痕迹，依然在南北不同的城市的人民中可以看见。

马德拉斯本身也是一个多采的城市，碧绿的草地，盛开的红花，蓝色的海滨，灰白色的高而苗条的椰子树干撑着像伞一样的绿叶。绿叶下边挂着一串棕色的椰子。这是一个活像农村，但是同时又是一个有着欧式建筑和马路的现代城市。

在马德拉斯，印度主人招待周总理看印度著名艺术家玛拉·拉希姆女士的舞蹈。印度舞蹈分四派。拉希姆女士跳的是巴拉、那蒂姆舞。这派舞蹈原是宗教色彩很浓厚的。要求高度的技术和严格的姿态和格式。往往是先表演优美的姿态和形象，然后渐渐地过渡到故事性的表演。拉希姆女士姿态优美，几乎全身一统，眼睛、眉毛、嘴都有节奏地配合手足的舞蹈而活动。她轻盈敏捷的动作，火热的舞姿，把表演故事和感情生动地传达给观众，博得大家经久鼓掌。演出后周总理上台和她握手，祝贺她演出的成功。

六日，我们乘车前往马德拉斯以南三十七英里靠近海滨的七世纪的巴利普南石窟遗迹参观。这个石窟使我们想起柬埔寨的吴哥；在这里人们看到印、柬两国的纽带。

总理坐在美丽的海滨神殿的大石上休息，主人送上鲜美的椰子给他解渴。在这里周总理邀请了天天跟在后面采访的新闻记者来谈话，其中有印度各大报、通讯社和英美法通讯社和报纸的记者。英美记者有些是从柬埔寨跟来印度的，他们还准备跟下去，到緬、巴、尼等国，采访周总理的访问。人们从周总理到达新德里那一天起，就盼望周总理能够接见他们。现在，就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在热带的阳光底下，有着名胜古迹的，自然而不局促的气氛中，周总理和他们一问一答地交谈，最后还在一起照了像。“这样的记者招待会”一个西方记者说：“我一辈子也没参加过。你们总理真是平易近人。”

七日，我们到了阿申索。印度朋友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是独立后，全部自己建立起来的印度“鲁尔”。这里既产煤，又产铁，而且靠近加尔各答的港口，运输非常方便。我们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参观。但是当我们来到了七年以前还是一片荒野，现在以奇塔姆地方为机械制造厂为中心，已经成为拥有学校、医院、娱乐场所、职工宿舍等四万人口的城市时，我们和印度朋友们一样地感到非常兴奋。

离奇塔姆机械制造厂六十英里是辛德利的每天生

产一吨吨肥料的化学肥料工厂。它也是印度独立以后投入生产的。现在它的产品可以满足印度农业的四分之一的需求。规模很大，设备也很新。

九日到达了加尔各答。我们在孟买的时候，深为印度人民欢迎的盛况所感动。但是一位印度朋友说：“等着瞧吧，加尔各答会比这里更热烈呢！”加尔各答是工商业的中心，劳动人民众多，并有着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的光荣传统，这都是我们熟悉的。但是只有到了加尔各答，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位印度朋友说的话。加尔各答是印度第一大城市，人口三百万，夹道欢迎周总理的却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从机场到总督府十几里的路上，到处是密密层层的人群。每个建筑物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不停送的公共汽车的顶，土堆上也都是人；人们爬上树、电线杆——一切能够居高临下的地方。真是“人山人海”。他们使劲地欢呼“印中是兄弟！”“五项原则万岁！”“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当周总理站在敞篷汽车上向群众合十致意，驶过的时候，人们欢喜地跳起来，举起手、搖着旗子……第二天，我们中间有些同志去参观市容。过路的人微笑着向我们点头、握手。我们正在东张西望着景色时，突然听见旁边叫了一声“印地、索尼、巴伊、巴伊！”坐在人力车上的，干脆说一声“周恩来”，揮揮手和我们打招呼。真是到处是善意，到处是友情！帝国主义宣传机喉舌广播由于苏军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了革命活动，中国人将受到印度人冷淡的“预言”破灭了。

在一个傍晚，周总理、贺副总理及随行人员，被招待攀登加尔各答高耸建筑——市府办公大楼——的屋顶，俯瞰全市的景致。在市中心，人们看见英属东印度公司命名为威康堡的十七世纪英国式的建筑。不多远，我们又看到英国法庭旧址。一位印度朋友笑着说：“法院、监狱是殖民主义最关心的一件事。”

我们转过头来看沿着孟加拉湾的海边。那里烟幕籠罩着浅浅的岸沿，有几只木船停泊在那里。印度劳动人民灰黑色的暗影在移动着。海的远处有着大汽輪的黑影。人们想起二百年前，侵略者就是从这条路上岸，把枷锁套在印度人民的头上的。

我们不少人对加尔各答这座城市发生兴趣。它有很现代化的建筑和街道。到过欧洲的同志说，假如撇开印度人和炎热的气候不说，很难看出它和欧洲的大城市有什么分别。但是，离开这些过去欧洲人集中的商业中心和住宅区，人们就经历另外一种境界了。那是一般市民的天地。它的街道有些像我国内地中等城市的街道，两旁都是一排排的平房商店。那里你可以买到一切日常用品；人们坐在小饭馆门前，等候着浪浪的油锅里煎着的米餅。赤着脚的人拉着高大的人力车在你面前走过，向你兜生意。人们拿着木桶，排着队站在街边的自来水管旁等候装水。街边的理发师和顾客面对面坐着；一个理发，一个拿着一寸来大的玻璃照着自己正在被整理的头。浑身是汗的劳动者，

白石炮台上的姑娘

白 艾



在祖国的南海边，
一座美丽的白石炮台上，
住着一个水兵姑娘，
她年轻、温柔又漂亮，

当她只有十八岁的时候，
她就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随着解放军的队伍
驻守在这白石炮台上。

人人都说这地方荒凉，
沙漠里长不出庄稼，
陡峭的山坡上——
不能放牛牧羊。

大海边暗藏着礁石，
渔民也不到这里来撒网，
还有那对面岛上的敌人，
常用炮火轟击这块地方。

可是这个勇敢的姑娘，
她却热爱着这个地方，
她说：“厦门是祖国的大门，
保卫它，就要驻守在这炮台
上。”

初升的太阳閃金光，
大海里掀起了波浪，
她向金門島上的人
發出祖國的召喚：

“回來吧，蔣軍官兵弟兄們，
你們的老母日夜把你們盼望；
妻子兒女等着你；
祖國的建設需要添一分新的力
量。

十五的月兒圓又亮，
家家都團聚在一堂，
你們啊，却長年困守着孤島，
思鄉的眼泪流湿了衣裳，

看看大陸上的燈光，
一天比一天亮！
馬路上的人群熙熙攘攘，
漁家的姑娘也都穿起了花衣
裳。

成隊的漁船兒出海回港，
鷹廈路上的人們鞋忙忙；
廈門大學的五座大樓蓋起來
了，
年青人在草場上跳舞歌唱。”

風啊，停一停再吹！
浪啊，靜一靜再吵嚷！
讓祖國的聲音，
穿過島雲，越過巨浪，
一字字，一句句傳到金門島上。

海浪翻滾嘩嘩响，
大海像憤怒的巨人的胸膛，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一个蔣軍的連長躍入了海洋，
一个浪接着一个浪，
年青人迷失了方向，
当他正走投無路，
猛然听见“大喇叭”在响，
多么亲切的声音呵！
他挣扎着奔向發出声音的方
向。

姑娘日夜工作在白石炮台上，
像一只海鷗恋着深沉的海洋，
她的声音像波涛，
震撼着台灣的心臟！

(李国靖插图)

拿着一塊布，捧着公共自來水管流下的積水洗頭、擦身。還有擦皮鞋的，擺地攤的……。

加尔各答屬西孟加拉省，省督是杰出的已故印度女詩人、甘地的战友奈都夫人的長女。她的主要助手——首席部長是羅依大夫，一個年逾七十的印度名醫、爭取民族獨立的老戰士。現在每天早起，為市民看病一小時之後才去上班，執行首席部長的職務。他的生活是十分樸素，我們看見他總是穿着白色粗織土布的民族服。周總理在加尔各答市民大會上的講演就是他充當翻譯的。

離開加尔各答——也是離開印度的前夕。周總理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一個英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問周總理，在他訪問印度之後，認為過去英國的統治，到底好處多還是壞處多呢？什麼是它對印度的好處？

周恩來總理笑着說：“這個問題應該由印度朋友來答復，但是我能夠告訴你們關於殖民主義在中國遺留下

來的罪惡情況”。他指出中國和除了日本以外的所有亞洲國家，比西方國家落后幾十年，都是殖民主義奴役的結果。他說：“我們並不是僅僅在印度的村莊和城市之中才能看到殖民主義給人民帶來的痛苦。這正是我們為什麼要消滅殖民主義的原因。……你們也許會說殖民主義者曾在東方國家建立一些工業，修建了一些港口和工程。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們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而做的。不要忘記，所有這些建設工程都是所在國的人民完成的，是在剝削這個國家的同時完成的。如果我們算一算賬，我們可以有的把握地說，西方國家老早把他們的投資賺回去了。”……（未完）

① 英臥兒16世紀初，從阿富汗入侵印度的民族。從那時一直起到18世紀初英臥兒王朝統治着印度。其後逐漸衰敗，到1857年印度人民抗英武裝起義又失敗後，最後一個英臥兒王朝被放逐出國。英臥兒王朝在印度留下許多宏偉而美麗的建筑，如泰古陵。

从生理学角度談婚齡問題

中国协和医学院生理科主任教授 張錫鈞

近来，我看到各报刊的报导，以及从有关婚和生育問題的座談会中，知道现在有些地方有不少青年一般在十八、二十岁左右，有的甚至还不足这个年齡，就結了婚，有了孩子，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她)們的学习、工作和健康，使他(她)們陷于苦惱中。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作为一个生理科学工作者，我願意从生理学的角度，对于結婚的年齡問題，提出个人的看法，供青年同志們参考。

結婚是关系男女青年一辈子的件大事。結婚以前，需要在各方面准备一些条件，生理上是不是已經完全發展成熟，是特別需要慎重考虑的条件之一。

我国婚姻法上規定的結婚年齡是女子十八岁，男子二十岁，根据男女青年生理发育的情况来看，只能認為是最起码的、最低的結婚年齡，并不是对每个人來說都是最合适的結婚年齡。

因为，大多数女子在十八岁、男子在二十岁的时候，生殖器官发育虽然已经开始成長了，可是全身的生長还不充分。單从女性的性功能、月經、陰毛和乳腺来看，絕大部分人在十五、十六岁时已经开始成熟了；可是身体其他部分的生長，特别是骨骼，直到二十岁左右，才臻完全。男子有的在二十岁生長还不足，一般大約在二十五岁左右才能發展完全。如果女子在十八岁或十八岁以前結婚，因为身体各部沒有全面成熟，就往往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由于女子盆腔組織細胞还没有发育健全，生殖器官的組織細胞很嫩，很容易受伤，这样在生育小孩时便常發生問題：不但母亲有难产的危险，嬰兒死亡率也是相当高的。就是嬰兒活了，也可能由于先天不足，不一定是健康的。至于母亲的健康，因为过早生育和哺乳等，也容易造成體質衰弱下去和早衰的現象。

另外，在这个年齡間，高級神經的抑制活动还比較薄弱，对于性兴奋的冲动，往往很难控制。这个时候，一对青年男女結了婚，一方面容易發生房事过度，引起各种各样的虛弱症狀，不但对工作和学习不利，而

且还会大大减少家庭生活的幸福。

那末，究竟什么年齡結婚比較合适呢？

从生理观点來說，中国女子比較适宜的結婚年齡是20—25岁，男子是25—30岁，在这个年齡男女双方全身发育都成熟，也比較能够理智地处理性欲問題。生产的小孩一般比較健康结实，母体也比較安全。据中国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大夫30多年的临床經驗，証明我国女子在25岁左右，生第一胎小孩是最好的時間。有許多人認為女子过25岁因“骨質硬化”而会难产，这是沒有科学根据的，是一种誤解。

有人問：男女双方認識已久，都有同居的要求，推迟結婚，是否会影响健康？

結婚是一个人生理上自然的要求，不結婚是不正常的，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但我們是主張不要过早結婚，不是主張不結婚，也不主張推迟到30岁以后才結婚，因此談不到对身体有害。如果我們每天把工作、学习、鍛煉、文娛活动有計劃地安排好，一心一意地爭取“三好”，即使生理上有性的要求，也不会感到非要結婚不可，更不会影响到身心健康的發展。

也有人問：为了解决手淫和遺精的毛病，提前結婚不是一个好办法嗎？

手淫是一种坏习惯，常常犯手淫，对身心健康都是有很不利的影响的。糾正手淫的坏习惯，应当从衛生教育着手或采取医疗措施。至于一般遺精，往往是生理現象。俗語說：“精滿自溢”。偶尔夢遺，或每十天半月遺精一次，对一个性成熟的男子來說，是很自然的現象，絕不是病，对身体毫無損害，不必顧慮。我們应当懂得，有強壯的身体，才有快乐的家庭。既有了常犯手淫的不健康的毛病，不去加以糾正，而幻想提前結婚来解决，这是很錯誤的。

已經早婚了的青年，也不必因此就苦惱起来，对他(她)們來說，應該注意节欲和避孕，实行有計劃生育。要实行計劃生育，就應該到醫院去征詢可靠的避孕方法。

回憶“西南聯大”的學生生活

汪子嵩

抗日戰爭初期，我在浙江南部一個小鄉鎮讀高中。那時，住的是破廟，吃的也從黃糯米飯漸漸改為稀粥，粥里摻許多番薯，吃的時候很容易飽，但吃了不久肚子就會餓得咕嚕咕嚕叫；菜是每人每餐半小碗鹽水煮青菜，後來連青菜也吃不起了，就改吃鹽腌菜。1941年下半年我到昆明進“西南聯大”念書的時候，真感到好像是進了“天堂”一樣。但是怎麼樣的“天堂”呢？說出來現在的大學生恐怕會覺得可笑的吧。

先從生活談起

聽說昆明西郊原來“西南聯大”的校舍現在已經改建成漂亮的樓房了。我倒著實依依那些像兵營、也像馬房的草屋屋子呢，想起來還為之神往。說它們像兵營，因為它們整整齊齊、一幢接著一幢地排成幾列。屋頂是稻草鋪的。我們住了四年，記得只加鋪過一次草。所謂窗子，只不過是一個大木框釘幾根木條，晚上睡覺時拉上一塊破布，半夜里如果刮風下雨，我們就只能躺在床上撐開雨傘來和風雨作鬥爭了。有時候上面草頂也漏雨，一把雨傘不夠，再加上一把，還是擋不住，那就只好把頭鑽進被窩里，一覺醒來，被子也就可以擰出水來了。記得有一天半夜下了大雨，第二天醒來一看，屋裏屋外成了一片湖，擱在床下的箱子浸在水裏，鞋子飄在水面，像一只只小船。

一間屋子面積大約有四、五十平方米，里面住四十個人。雙人床連着雙人床。每兩張雙人床之間擠上



當時“西南聯大”學生宿舍的一角。

兩條狹長的板桌，就是四個人的寢室和自修室。一間屋子裏有这样的十個組，分成兩列。因此，無論下午或晚上（上午大都上課去了）你要是在寢室裏學習，總會聽到有幾個組裏在高談闊論或打橋牌，也總有幾個人在大聲念英文、德文或者法文。半夜里如果失眠

了，睡在東頭的人可以听清楚西頭某一個同學的鼾聲。但最攪人睡眠的還不是這些聲音，而是由於床搭着床，以及貧窮帶來的疥癬等造成的那些小蟲虫。

再來說我們的吃吧。一說到吃就得先提到錢。住可以不要錢，吃總是要錢的。如何做得上飯費？成為大多數窮學生最頭痛的問題。有很多同學不得不在外面兼差：中學和小學的教師，機關和商店里的小職員等等。但是工作也不容易找，再說了工作難免不妨礙自己念書。我在聯大四年中常常被膳食委員逼繳飯費，被逼得沒法時只好到處求人借貸，到告貸無門時就只能跑拍賣行和舊貨店，先賣一時用不着的衣服和書籍，慢慢的就連必需的東西也只好出賣。有的同學賣掉仅有的棉被，晚上就蓋着自己所有的衣服睡覺。穿不起襪子，鞋子缺了後跟，衣服上東一塊補錠，西一塊補錠，面黃肌瘦，揀着南腔北調的年青人，昆明人一看就知道這是聯大學生。

話扯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膳食。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吃的米。市面上的米價實在太高了，後來总算可以買所謂“公米”。買“公米”要跑到很遠的地方，都是同學自己去買，這且不提它。最苦的是“公米”不但是紅色的，吃起來有點像高粱米，而且摻雜了許多砂子、碎石和谷子，每吃一餐飯總得仔細的撿，一個人可以揀出不小的一撮。記得有一次買到的“公米”雖說是“米”，倒摻了一半谷子，人終究不是雞，吃了几口實在咽不下去，只好擱下飯碗不吃。這個時候除非是身邊有零錢或是可以借到錢，不然就只能餓肚子。由於膳田是由學生自理，可以避免當時流行的貪污，所以聯大膳田中的菜在昆明是有名的“價廉物美”，連校外人都想來搭伙。其實，所謂“物美”也不過是每桌只有四小碗菜，八個年青的小伙子，只要中間有一個人稍為不“斯文”些，往往吃不到半碗飯，菜就吃完了，只有靠菜碗底里的殘湯來對付，吃得慢的人往往靠收羅一桌桌的殘菜湯下飯，我們叫這是“打游齒”。另外，膳田里收的錢都只够吃兩餐，除了少數有錢的學生可以到門口小攤子上吃些早点外，一般都沒有早餐，餓肚子上一早課是常事；有些同學為了怕餓肚子只好躺在床上不起來，寧願犧牲几堂課。

現在的大學生看了，一定會奇怪：這種生活又如何能學習呢？

我們是如何學習的

先談上課。上課的教室也和寢室是一樣的泥土房

子，也往往漏雨。而且，教室里座位不够，迟到一点的就只好站在后面或爬在窗檻上記筆記。教室又分散得很，从新校舍到昆北食堂得穿过城牆缺口，从城外到城里，跑得最快也得十分鐘，往往急着跑去也是迟到，就只好站在教室外面听课。

除了上課就是自学，自学首先需要書，联大圖書館一共才几万册書。特别是那些基本課程的必讀參考書，像“經濟學概論”，全校选课有几百人，而圖書



这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圖書館(中)和办公室。

館却只有十几本書，每次圖書館開門之前，門外挤滿了人，很多人都是为了搶借這本書。圖書館的座位很少，平时还勉強对付，快考試时就緊張極了，一吃完飯大群人都挤在圖書館門口，等它開門去搶書、搶座位。圖書館的大門和借書的櫃台有好几次都被大家挤破。有些同学有这些必讀參考書的，大家輪流向他借書看，能借到看几个鐘头、記下些筆記，就非常滿意。書和衣服用品一样是我們活動的財產，有錢時去買進來，等做不起飯費時只要在牆上貼張出售的布告，書就从这个主人手中轉到另一个人那里去了。

現在的学生常常會向行政和教師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或者是書不够了，教師就得給想办法；讀書不知如何讀法，作論文不知如何做，教師都得來指導。当然教師有指導学生的責任，这些要求應該盡量滿足。但有时候这些要求提得太多，使人有了印象，好像是要別人將一切条件都現成摆好，然后才能請你来學習似的。从前做学生，就根本没有提出这样那样要求的权利和可能。教授是有名的，但他只管上課講書，下课就見不到了。我在中学时英文沒有学好，一進大學，參考書全是英文的，沒有办法只好从頭啃英文法，翻破了一本字典，勉強學會了看書。平时發生了問題，或是上課听不懂，就只能自己找人請教，更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找參考書。圖書館書雖然不多，对一个初学的人总还够用，每一門課都有一張參考書單贴在圖書館里，翻來翻去漸漸自己就摸索到一些學習的門徑。

在那种条件下面，我們不但學習着，而且对周圍的事情关心着、斗争着。我們雖然穷，但还節省一点錢，几个人偷偷地訂份新華日報（当时中国共产黨在重慶出版的報紙），組織各种讀報和讀書小組，热烈

地爭論着。“資本論”这类書从这个寢室傳到那个寢室。有人在半夜点根洋燭，悄悄地在臘紙上抄“新民主主义論”，过几天一小本一小本非常模糊的油印小冊子在許多人手里流傳。在学校牆上挂滿了各种壁報，各种意見爭論着，而主流是：反对国民党的腐敗，要求組織民主的联合政府。学生会举办的時事报告会通常总吸引校内外几千听众。地下党組織通过各种形式，教育和組織群众，逐漸积累起革命的力量，使联大成为国民党后方的“民主堡壘”，掀起了好几次学生民主运动。

畢業以后怎么办？

我們在高中畢業時已經遇到这样的問題：畢業以后怎么办？多数人升不起學，也很难找到職業。記得我畢業那年郵局招考郵務佐，原来規定學歷是小学或初中畢業，后来录取的絕大多數是高中畢業生，我也去投考了，因为体格不及格，沒有被录取，同班畢業同学考取的不算。我們那班同学后来進大學的只有十分之一、二。

在大學住了四年之后，要畢業了，心上又沉着—塊石頭：畢業之后到那里去？要是有个亲戚朋友在社会上有些地位，或者家里有钱，一个大學畢業生自然什么事都可以做。缺了这两条，職業就不大容易找。例如經濟系畢業生最好的希望是到銀行当職員，但沒有人介紹就進不了銀行。因此，學經濟的人如果能当上一个英文教員，我們學哲學的人也許去当上个历史教員，也就感到滿意了；說不定學哲學的人去教教、理、化，那也只好硬着头皮上講台。即使这样也不容易。有人在外面当家庭教師，教有钱人家七、八岁的小孩子，兼作保姆，每天还得接送孩子上学；也有人到小商店去作會計，兼当櫃台上的伙計。我畢業之后就連这一类工作也找不到，当时可惜郵局沒有招考郵務佐，不然我也会再去投考。我想請求在学校里做一个圖書館管理員，托一位教授去問，回答是圖書館沒有空額。我真是在走投無路的时候才下决心投考研究生的，后来侥幸录取了。录取的人很少，因为投考的人原来不多；誰願意在当过四年穷学生之后再來当同样穷的研究生呢？我考上研究生，又在草屋裡住下来，倒也感到心滿意足，不但是还有飯可吃，有書可讀，也因为在我同班畢業的八、九个学哲學的学生中，当时好像只有我一个再繼續學哲學的。

現在每年暑假畢業生分配工作时，常有些同学來向我表示：非將他留在北京不可；或是因为没有將他分在綜合大學而是分在專科學大學當助教了，他就說这是小看了他，他受了委屈等等。好幾次我都想和他們談談这些往事，每次我都忍住了，因为我想：他們生活在新社会里，應該讓他們幸福。現在我想：我还是應該對他們說这些往事，他們才能真正知道他們今天的幸福。



年 青 的 當 家 人

浙江 董泰華

打完羽毛球，我一口气跑到办公室门口，用脚使劲一踢，门“嘭”的开了。刚要把衣服放到椅子上，只听“砰”的一声，原来是进来时用力过猛，门碰在墙上撞回来了。“太不注意了！玻璃门又不是铁门，撞碎了又得拿钱去买，真是不知艰难！”门外传来了抑制不住气愤的声音。太刺耳了，玻璃又没有撞碎，就算撞碎了，我赔吧，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些气愤，准备去找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顶几句，却有人从外面推门进来了。进来的是一个青年工友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走到我跟前抱歉地说：“老师，你别多心，我每看到公家的东西被糟蹋时，总感到心痛，刚才心直口快地说了几句，你……”“喔！”我心中一动，脸上立即热烘烘的一直烧到耳根，“没关系！没关系！”我含糊糊羞愧地回答。

从此以后，我和他认识了，每当他来扫地时总是随便和他谈几句。原来他是1955年才从部队转业来的，父母都在乡下种地。他的名字叫俞侬，但大家都叫他乳名阿绍。阿绍的脾气的确有点躁，也爱管“闲事”。初来学校时，一些学生对他很有反感。记得一个星期日下午，靠十个同学在草场上玩篮球。因上午刚下过雨，草场上还有一窪窪的水堆。阿绍从篮球场走过时，篮球滚过水窪，湿漉漉的滚到他的脚旁。他弯腰拾起一看，篮球饮饱了水，重甸甸软糊糊的。这可恼了火，他朝着同学大声说：“不要打了，篮球湿啦，地干后再打吧！”一面说，一面就拿着篮球走了。同学们一看他把球拿走了，就一拥而上把他围在

中央：“篮球是作兴打的，你敢禁止我们运动？”你算什么人？拿来，篮球坏不坏你管不着！”同学们一面夺球，一面朝他指手划脚地乱嚷。他气得腮门上的青筋条条挺起，转身就走，篮球畢竟被同学们夺去了。“嘿！你气有什么用呢？乖乖的走才是呢！”同学们觉得胜利了，重又玩起球来。过了几分钟，阿绍两手拿着两个字纸筐，朝着篮球场走来。“看！又来了！”同学们警觉地看着他，等到一看字纸筐内盛的是薯藤灰，才明白过来，但都站着不动。阿绍把灰铺在水堆上，用脚踏踏平，这时，已经有几个同学来帮助他铺灰了。“好了，这样就能玩了！”阿绍拿着两只空筐走了。同学们惭愧地低下了头，其中一个拿起湿漉漉的篮球在沙堆中滚来滚去。

一天午膳后不久，阿绍气匆匆地奔进来：“太不像话了，董老师，同学们不知道种田人的辛苦，随便糟蹋东西！”原来，这天中午吃番茄，阿绍到厨房去担番茄皮喂猪时，看到地上、桌上、牆角落、陰溝里到处都是同学们扔着的半团的、整团的番茄，拾起来一称就有24斤多。他要我用红纸条写“同学们，痛心吗？”几个字。下午，教室大樣的入門处，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堆着阿绍拾来的大堆番茄，方柱子上贴着我写的“同学们，痛心吗？”几个大字。桌子周围围满了学生，有的红着脸低着头走开了，有的看到这高高的一堆“呵！”的吃了一惊。

过了几天，同学们浪费粮食的现象大大减少了。我在生物实验室旁碰到阿绍，他蹲在地上，身旁放着一小堆砖头和一个盛着石灰的木

桶，正在补牆洞。“阿绍同志！这个展览会开得不错，这几天情况好些了吧？”“当然罗！”他偏着头，圆圆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同学们也都不是故意的，只要一提醒自然就改过来了！”

老实说，我虽然觉得阿绍很多事情作得对，但有时也感到他“自找麻烦”。每天晚上同学就寝以后他总要团团检查一周：看教室的门窗关好没有，电灯关了没有，自来水管子有没有在流水……。他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一闲着就难受，总是去找些事情来作。在储藏室堆了好久的破爛衣袜，和一些廢了的考卷，从来没有人理的，他也一大捧一大捧的抱了出去。我问他：“干什么？”他只说：“有用。”从此，星期天他就老蹲在屋子里不出来，把破衣袜裂成一条条的，把廢卷子裁成方方正正的。直到这学期每班發了一条拖带时我才明白原来他用破衣袜做成了拖带，用廢紙做成了一叠叠的信封。夏天，天气正热的时候，人們都午睡了，他却戴着頂已經被太陽晒得成了紅褐色的草帽，坐在江边剖皮。一件灰黄色的襪衫（旧



軍服改做的) 濕漉漉地緊裹着他的身子, 就這樣犧牲了一個多月的午睡時間, 修好了學校沿江20多公尺的籬笆牆。

去年暑假, 阿紹沒回家。快過中秋的時候, 有台風經過, 上級要我們組織力量護校和搶救。老師們都回家去了, 留校的工友也不多, 只好把一部分留校同學也組織起來。半夜風越刮越猛, 江水越漲越高, 眼看就要漫過堤岸。这可糟了, 白天誰也沒想到潮會漲, 圖書館和實驗室的一些東西都還沒有安排好。我連忙拿了手電筒去找阿紹, 剛走出去, 就看見地上一片汪汪大水, 我也顧不得脫鞋, 直往阿紹的寢室跑。走到體育館附近, 突然聽到前面一溜嘩嘩的水聲, 我用電筒一照, 只見阿紹穿着件單軍服, 褲管卷到腿上, 雙手掖着個實驗室的玻璃筒(筒裏還放着好些瓶子)吃力地跑過來。後面跟着五、六個同學, 手中都抱滿了東西。“董老師,



同學們真好, 幫助我把圖書館的東西收拾好了, 還幫我一起搬藥品呢!”阿紹一看到我就像起來。我亮着電筒給他們照路, 突然刮來一陣風, 瓦片“沙沙”地飛下來。“哎喲!”是阿紹從牙縫裏喊出的聲音。“什麼! 什麼! 瓦片落在頭上了嗎?”我急忙問。“沒什麼, 搶救要緊!”阿紹

又抱起玻璃筒往前跑了, 前面飛起了陣陣水花。兩個鐘頭以後, 實驗室的一些貴重藥品和儀器都安排好了。阿紹雙手絞着濕淋淋的衣服走進來:“董老師, 還有什麼東西要搬呀?”“呵!”我看到阿紹頭上流着一條條的血, 有的血已經和頭髮攪固在一塊完全變成黑褐色了。“快去包紮一下吧!”我催促他。他摸了摸頭淡淡地說了句:“沒什麼。”又跟同學們一道忙起來了。

阿紹的積極工作已經贏得了全體師生的敬愛, 在去年10月間入了黨, 平常老師和同學們都親切地稱呼他“年青的當家人”。有一次我好奇地問他:“阿紹, 你干嗎作那麼多不是自己份內的工作呀? 難道不嫌累嗎?”他抬起頭來看我一眼, 不好意思地、輕輕地說:“董老師, 你說我是工人階級對嗎? 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 是主人就該拿出當家作主的态度來呀, 有什麼可累的呢!”(李國靖插圖)



我和妻子

重慶 流 刃

“你的脾氣怎麼變得這樣好哪!”這是妻子在一天早晨醒來時對我說的。望着她閃閃發光的眼睛和冥想什麼似的面孔, 我不禁感到慚愧而又高興。

我的妻子, 論性情和容貌是無可非議的, 可就是文化程度低, 沒有參加工作。因此, 我常常:“單靠我一人每月四十多元薪金, 供全家四口人吃穿, 真夠受。”有時, 看見別人夫妻倆都參加工作的就更羨慕。心想:“要是她也參加工作, 每月有三四十元的, 該多好呵!”雖然一個四口之家, 在重慶照目前的情況也能過得去; 但每當孩子們生了病, 或想添制點衣物的時候, 就

感到有些緊。腦子里這樣一想就發悶。由於這種悶氣和苦惱, 也就不時地對妻子發火, 有時, 在工作中碰到的不快也回家向她出氣。雖然, 我從沒有打過她一下, 但經常的冷言冷語也够她難受了。記得有一次大孩子病了, 妻子心里很着急, 問我有錢沒有, 要給孩子看病。當時, 我連最起碼的體貼和關心都沒有, 反而向她諷刺地說:“錢! 你又不到那裏去找幾個, 自己沒那個本事只曉得伸手要錢!”妻子委屈地說:“孩子病了, 難道……”沒錢, 沒錢就不醫, 病死了少些麻煩!”我冷冷地說了一句, 隨即恨恨地走了。平時, 我對孩子們也沒有什麼关

心, 給他們的只有惡毒的呵責和野蠻的打罵……每當我發火的時候, 妻子總是默默地抱着孩子走開了, 過後, 對我仍然是十分关心和體貼。可是, 我呢, 認為這一切都應該, 因為我辛辛苦苦掙錢養活他們嘛。

去年十月間, 妻子要回娘家去。臨走前, 一切都給我和大孩子安排好了; 所有的破衣服、鞋子、袜子都在夜間趕着縫好; 鍋灶、木盆甚至牆壁縫子都補好了。“你在家裏沒甚么了, 伙食在外面搭, 星期日有空, 想吃什麼的話, 自己弄點吃, 衣服也可請人洗……”她向我交代了, 又叮囑大孩子要听话, 然後才帶着小女兒走了。我以為這一下家裏一定會搞好了。可是生活就是要教訓一些愚蠢的人。

有一天, 孩子的衣服扣子掉了, 一半天沒出去玩, 等我回家給他縫上。我回家後找出針錢, 沒縫几針

就猛一下把針尖弄斷了。又找了一根大的，試一試穿不過去，只好出去買。我跑到附近百貨公司去一問，售貨員說：“這兒沒有”。旁邊一位女顧客笑着告訴我說：“針，要在那些小鋪攤上才有。”我又匆匆地跑了十多分鐘才找到針錢攤，買回針后，就小心多了。試着試着穿過幾次，突然一針把手刺着了，疼得眼前冒金花。好容易縫好了，赶快叫孩子來穿，心里松了一口氣，感到有些疲倦，就躺到床上休息。孩子却老埋着頭在扯衣服。“你扯什麼？”我問。“爸爸，扣子扣起來有個洞洞！”“好好的衣服有個什麼洞洞呀！”我奇怪地問，坐起來一看，原來一顆扣子被我縫低了一寸多。怎麼辦？只好再縫一次。這時，妻子繼續補補不厭其煩的情景，一幕又一幕地



展現在我眼前了。

妻子在家時，我們每周打一次牙祭，因此這個星期天的早上，孩子硬要跟我一起去排隊買肉。肉買回家後高高興興地用“沙吊子”燉起來。到吃午飯時嘗了一下肉還沒爛，只喝了碗湯，準備晚上好好吃，吃了還可以去場電影。下午五點鐘作好晚飯，叫孩子去打醬油。我將“沙吊子”提起來擺在桌子上以後，就到附近閱報攤去看選電影節目去了。等我回來，剛到家門，就看見孩子哭喪着脸站在門口，揩着眼

淚。我問：“怎麼哪？醬油瓶子打破了嗎？”那知他回答說：“燉的肉打爛完了，我回家就看見倒了一大堆！”“就是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弄得的，哼！”我吼着給了孩子一耳光，認為是他偷偷搞壞了的。孩子哭了，我氣沖沖的跑進屋去，只見“沙吊子”碎成几大塊，油漬漬的肉湯幾乎滴濕了半間屋子，桌上放着一只大碗，只裝了點瘦肉，骨頭和蘿卜，我一氣之下，用力一推，又全落在地上打碎了。這時，鄰居張嫂過來勸我說：“你打孩子真是冤枉；你走了沒好一會，我就聽到貓翻倒了。誰叫你‘把沙吊子’放在桌上，放在爐子上不穩當嗎？”張嫂的話使我不怒中清醒過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自己才該挨兩下呢！我沒精打采地打掃着屋子，晚飯也不想吃了，孩子吃兩口白飯嘆一口氣，兩只大眼不時地瞪着我望。看着這種情形，心里很難過，“孩子，你媽在家該多好呀……”

妻子走后不到10天，好些該參加的會議和集體活動我都没能參加。每天，除了上班以外，休息時間都用在過去我認為一錢不值的“家務小事”上去了。自己常常搞得精疲力盡，還弄不出個明堂來。枕頭套洗了兩次，差不多用了一塊半肥皂，煮飯作菜提心吊膽還免不了要吃夾生飯和怪味菜，生活中接連不斷的大小教訓，使我認識了過去對待妻子的錯誤。祖國有着成千上萬的家庭婦女，都不是我所認為的：“一天在家里坐着吃……安逸……”誰還想到，在複雜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該有着她們多少辛勤和勞碌呵！

由於我對妻子的看法有了轉變，也就了解了許多自己過去所不知道的事情：那次孩子生病，妻子被我發了一頓“無名火”以後，就去向鄰居張嫂借錢來給孩子看了病。張嫂不但借錢給她，還幫助她看家、熬藥。竟發出艱苦朴素的

号召以後，我又了解到妻子平時在家的節約情況。真使人又驚又喜又自愧。她將我的舊衣服、破襪子等，改成孩子們穿的，自己買顏料來薰染了，孩子們都以為是新的。還在老早就和附近的婦女們互相學習了許多節省煤炭、水電……等操持家務的經驗。去年十一月間，妻子和她的伙伴們當選為區的街道工作積極分子，還出席了市的代表大會。鄰居們告訴了我好多關於妻子的事迹。其中，最感動人的是去年六月間，有一天我家附近的一個小巷里失了火，群眾慌成一團，連喊帶哭搶着自己的東西亂竄。我妻子是街道的治安委員。跑到巷子口去一看，是王彈花匠家失了火。那時火勢正旺，把尤、王二家的門都封了，屋裏傳來尤老太婆“救命哪！救命哪！”的呼聲。原來尤老太婆因孫兒在樓上睡着，火一起她首先上樓去抱孫子，等轉下樓來時，門已被火封了，烟濃得找不到方向，只急得亂喊救命。但人們都不顧死活地搶着東西往外沖，誰也沒顧得聽。妻子沖進巷子去也急得沒法。突然急中生智，抓來一個方凳，撿起兩件衣服塞在凳子裏，頂在頭上就沖進火門去。把婆孫二人都救出來後，自己手臂和肩膀都被落下的磚、瓦火柱燙傷了。但她很快地包好傷，又轉去搬沙、弄水、維持秩序去了……

“呵！女英雄，講點你的英雄事迹給我聽好嗎？”妻子開了市積極分子代表會回來時，我打趣着說。妻子微笑着回答：“什麼英雄呵，比我能幹的多着哩！”接着她給我談起開會的情況：“到會的我們婦女占多數，陳副市長說我們家庭婦女姊妹們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力量！”她忽然不講了，望了我一眼，俏皮地學着我往日的腔調說：“……你們這些家庭婦女，只知道坐着吃……”說到這兒，她忍不住笑起來。我也跟着慚愧而高興地笑了。

我是長沙
一个中学的学
生，有一个問
題我想提出來
談一談。

从上学期
开始，在我們
学校各个班里
普遍有了这样
一种情况：誰

也不願做社会工作。較普遍的想法是：学好功課，將來自己有了學問才是真的，社会工作做得再好，影响了自己的学习，將來升不了学还不是白费！于是，已被选做班干部的同学，也很少关心班上的事，有的甚至几次提出要求辞职。就拿我們班主席來說吧，他的学习是不错，过去对别的女同学的学习也还肯帮助，可是，上学期被选上班主席他却很不高兴。班主任找他研究班上工作，他也总是推来推去讓别的班干部去参加；对同学的学习也不关心，譬如，有一次晚自習时，两个同学因一点小事吵得几乎打起架來，他不仅不出来帮助解决，反而夾着書回宿舍去了。只害怕妨碍了自己的学习。

特别是这学期一开始，同学们从报刊上知道今年的中学畢業生要有一部分不能升学，于是不論是畢業班或非畢業班的同学，都在为着將來的升学擔憂。为了拚命地搞自己的学习，大家都不做社会工作了。上星期我們班在改选班會时，班主席一开始就公然声明說：“請大家不



社会工作义不容辞

湖南長沙 趙青

要再选我，反正选上了我也不干”；有一位同学还是提了他的名，他竟臉紅脖子粗地几乎罵了出来。另一个团员被选上了生活委員，結果跑到宿舍里还哭了一場。听說别的班里情况也并不比我們班好多少。因为有些班干部不积极，开会也不來，許多班里至今都沒有开一次班會討論班上工作。

我在班上担任团支部委員也已四个学期了。有时我也这样想过：做社会工作就要影响自己的一些学习時間，也想提出不干；可是再一想：班上这些工作沒有人做行嗎？能够只是要求別人來为自己服务嗎？这样似乎思想又通了，可是也还总觉得做社会工作只不过是为大家，对自己來說，畢竟是吃亏的事，所以工作也总还是不够主动。最近为这个苦悶，我曾找过我們的班主任余老师。余老师沒有責备我，却談起他的一段回忆，而且頗有感触地說：“我在学生时代也是整天死啃書本，不想参加課外活动，其实一到工作崗位上后，才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接着他談起了我较高

徐老师在大學里是同班同学，徐老师却一直在班上担任社会工作。他談到徐老师当时把班上的工作搞得如何活躍，自己如何安排時間，看起来徐老师的学习時間并不比別人多，但学习的效果却很好。余老师接着分析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徐老师在担任社会工作中，鍛煉了自己对问题的思考分析能力，思想就比較活躍，对学习也有帮助，也就使得他到工作崗位上后，很快地就能熟悉群众工作的特点和方法，而不像我这样吃力……”

余老师的这些话，啓发了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認識：現在在学校里做点社会工作，不但是为同学服务，帮助大家搞好学习，提高思想認識；对个人來說，也并非不是吃亏的事。

当然，我也認為，如果有个別同学负担过重的社会工作，以致影响了学习，那也是不对的，应该加以調整。但是大家輪流担任一点必要的社会工作，却应该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我們不应该只想等着要別的同学來为自己服务。

三二班班主任
徐老师的情
况。徐老师在
兩年不到的時
間里把一个全
校最乱的班轉
变成一个优秀
班。在全校師
生中威信很高。
他說他和

中國青年

半月刊

1957年第6期

(总第203期)

1957年3月16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青年社

社址：北京御河橋3号

電話：(5) 2632 轉 699

出版者：中國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東四門2條老君堂11号

電話：(4) 4761

印刷者：北京印刷厂排印正文

京華印厂印刷封面

總發行處：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勝處：全國各地郵局

代售處：全國各地新华書店

定價：每册 0.18元



一年之計在于春

(油画)

黎玉龙作



北 陵 (沈陽風景組畫之四)
(全國青年美術工作者展覽會作品)

馬文啓 作